**

这本关于美国占领下的德国红军的书，任何认真研究反帝国主义政治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第一卷：人民的炮弹》通过红军派的信件和公报的文字叙述了他们的发展历史。然而，这本书之所以特别重要和有相关性，是因为它的编辑们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记录。从这本书中，你将学到一个有力量的规模较大的团体所犯的错误，但这个团体（就像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在这方面的尝试一样） 无法在其所需要的水平上与一个“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成功的沟通。虽然武装斗争可以潜在地导致（be the seed of）更大的事物，但它也是与人民接触和交流的另一种手段。对这一历史时期感兴趣的学生应该好好学习这本书，并将二战以来作为在西欧运作的最大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武装组织之一的红军派的成功与失败化为己用。

——Ed Mead，前政治犯，乔治·杰克逊旅（George Jackson Brigade）

这本书思路清晰，研究细致，巧妙地避免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曾困扰着早期试图讲述红军派的短暂而持续的历史的尝试。它以战士们的陈述和信件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但作者们设法以一种既连贯又吸引人的方式来展现它们。国家试图压制政治犯声音的残酷行径——这最终也是无效的——的证据，及时而有力地提醒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囚犯仍然是我们今天运动的领导者。这是对分析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武装斗争和镇压与抵抗的循环做出的一项十分必要的贡献，既提供了资料，又能鼓舞人心。

——Sara Falconer，多伦多无政府黑十字联盟

关于红军派的第一卷是关于二战的一部分，在所谓的盟军击败了纳粹时，二战并没有结束。红军派战士出身于深刻的社会主义历史中，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祖国的生命而战。许多胜利和许多错误得到了评分（scored），这使人们对**真实的**历史教训能有重要的了解。对于所有严肃的学习另类历史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它作为通向更好未来的教学工具。

——b♀ （r.d. brown），前政治犯，乔治·杰克逊旅

从6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革命战略开始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大都市——城市游击队。曾经在古巴、中国或几内亚比绍的农村由农民武装发动的战争，突然被转移到柏林、罗马和纽约等帝国主义中心的以前是学生的小股人群手中。没有哪个城市游击队比西德的红军派（RAF）更出名或更被妖魔化了。我们在新闻标题中知道他们标志性的大胆行动：从1972年爆破位于法兰克福的美国陆军第五军指挥部，作为对华盛顿升级越南战争而在河内港口布雷的回应，到绑架并随后处决西德工业联合会主席，以争取释放革命囚犯的谈判。但我们从未听到过他们的政治声音。由于红军派的政治声明、辩论和公报没有翻译，甚至在左翼内部也没有英文版本。如今，一部关于红军派的重要历史文献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以极强的可读性记录了战后德国新左派的情况。更好的是，这项工作是由编辑/翻译完成的，他们反对屈服的资本主义媒体把红军派贬低为“病态的”找死的名人。在他们的手中，红军派的话语被揭示为对议会改良主义、工会主义和和平主义失败的严肃回应，以阻止德国自身形式的新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固化（被人用一层令人麻木的“消费者的民主”来粉饰）。年轻的红军派战士希望在他们危险的实验中获得解放，但他们愿意接受悲剧性的后果，他们的故事在情感上很难让人睁大眼睛去读。尽管红军派是有争议的，但他们在特殊的“反恐”设施中经受系统的酷刑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甚至抗议。事实上，这些特殊监狱是受到热门研究的美帝国主义最近侵犯人权的先例，从关塔那摩监狱到国内的超级监狱。我们所有人和红军派的关系，比资本主义公众所希望相信的要密切得多。这一切都在这里，在这第一卷的红军派纪实史中，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这本书工作的人。

——J. Sakai，*Settlers: Mythology of the White Proletariat*一书的作者

德国红军派：一部纪实史

第一卷

PROJECTILES

for the PEOPLE

*Bill Dunne和Russell “Maroon” Shoatz作序*

*André Moncourt和J. Smith作简介和翻译*

*献给吉姆·坎贝尔*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Jim Campbell*

“我们是一颗炮弹，”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在写给组织的一封信中说道，而这阐明了一种道德观点，即主体和他的目标会成为一体。这也意味着，如果“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进一步的分离，那么它的结局将是显而易见的：死亡。

Karl-Heinz Dellwo

Bill Dunne的序言

《人民的炮弹——红军派：一部纪实史，第一卷》，是对战后西方帝国-资本主义范式下作为城市游击队员开展武装斗争意义的重要阐述。通过快速翻阅《炮弹》一书，Smith和Moncourt让我们看到了RAF在德国的崛起，它从一个垂死挣扎的、被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卖国贼所误导和压制的左翼反对派发展起来。RAF的“人民的炮弹”记录了他们的政治、实践、知识和情感轨迹，到他们为了革命的共产主义阶级战争而拿起并使用枪支。《炮弹》一书把他们的声音带给我们，并将他们的背景与我们的联系了起来。

《炮弹》一书向我们展示了RAF如何在不陷入冒险主义的情况下参与人民战争。它展示了通过对环境、时间以及地点要求的复杂分析，游击队怎样能与看似不可能的盟友合作，并有意识避开表面上看起来可能的盟友。它说明了同志们是怎样把经常发生的致命错误和失败的痛苦经历以及正确实践和胜利的喜悦吸收并化为己有的。它解释了组织是如何认识和回应敌人的诽谤运动，这些诽谤运动旨在制造对地下组织的虚假反对。在对这些和许多其他RAF实践要素的探索中，《炮弹》一书从而说明了RAF是发展到了可以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中武装斗争的最高表现，以及RAF是如何做到的。

然而，《人民的炮弹》绝非一本枯燥的历史专著。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关于斗争的故事，它把我们带入了思想和行动之中。这种摆放传达的不仅仅是对RAF实践的一种感觉或理解。它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方式传递一种联系。自从阅读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后，我还从未如此着迷于政治叙事。尽管读起来像一部历史惊悚小说，《炮弹》一书让我们看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罕见融合，任何渴望革命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RAF也许不再与我们同在，但它已经为当前争取最公平社会现实的运动准备了基础，并能为其提供帮助，在这一社会现实中，所有人都将拥有最大可能的自由，来开发他们作为人类的全部潜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能将RAF的生命、时代和遗产如此清晰的呈现。

Russell “Maroon” Shoatz的一些话

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敢于大声反对当权者对他们施加的一切的人，需要阅读这本书。西德政府对红军派所采取的镇压手段——经作者详细介绍的——已被采纳、普及和改进，可在离你不远的监狱、拘留所/拘留中心或其他“收容中心”使用。

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垂死挣扎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可能正处于斗争的最后阶段，但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野蛮”，而是我们星球上大多数人开始理解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于灭绝主义！

这本书中详细介绍的监狱隔离和酷刑方法是压迫势力抓捕表明其灭亡的全球物质力量的最后努力之一。

在经历了几十年类似的孤立和折磨之后，我只能提供一条建议：要么站起来与这个怪物斗争——并面对书中详细描述的恐怖——要么躺下来接受这个想法（和现实），即21世纪的资本/帝国主义——不受约束的——将摧毁它接触到的任何东西。

Bill Dunne于1979年10月14日被捕。他被警察开了三枪，据该州称，他曾参与将一名同志从西雅图监狱救出来的行动，这名同志隶属于一个不知名的无政府主义团体。1980年，他被判95年监禁，1983年，由于企图越狱，他连续被判15年监禁，外加5年监禁。正如他所说，“总计105年‘就是他们觉的合适的假释’之类的话语。”

1970年，Russell“Maroon”Shoatz被指控袭击费城警察局，造成一名警官死亡。他转入地下，在黑人解放军当了18个月的士兵。1972年，他被捕并被判处多项终身监禁。他两次逃脱——1977年和1980年——但两次都被抓了回来。他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包括现在，都是在隔离的环境中度过的，每天被关押22到24小时。

鸣谢

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更多的人已经通过多年的努力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提供了地下组织的声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日子里，一些运动出版物负责翻译和分发像红军派这样的非法组织的文本。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Resistance*（1980年代，加拿大温哥华）、*Arm the Spirit*（1990年代，加拿大多伦多）、*l’Internationale*（（1983-1984年，法国）的工作者。尽管没有特别关注游击活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多伦多的*Prison News Service*，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及。

我们必须感谢法国出版商Maspero，他们的几本书对我们很有帮助，还有Nadir、Extremismus、Zeitgesichte和Marxist Internet Archive，所有这些机构都维护着优秀的网站。

2003年，Anthony Murphy翻译了RAF的*The Urban Guerilla Concept*；虽然我们最终没有使用他的版本，但我们仍然感谢他的工作和帮助。

如果不是前RAF成员罗纳尔德·奥古斯汀（Ronald Augustin）在网上维护保存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的红军派文集档案，这个项目就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进行。我们特别感谢IISH和Augustin。

这本书中的许多图片来自*Vorwats bis zum nieder mit*的图书和CD，由Sebastian Haunss、Markus Mohr和Klaus Viehmann编辑，内容来自各种档案，并由Verlag Assoziation A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http://plakat.nadir.org/上查看这张CD的全部内容。我们感谢所有参与制作这一艺术作品的人，以及相关的书籍和网站。

Dan Berger和Matthew Lyons对我们早期的草稿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反馈。Henning Boke， Jutta Ditfurth、来自PCF（mlm）的同志、Leftist Trainspotters和Marxmail邮件列表的成员们，都为关于西德激进左派和游击队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答案。Muhammad Abu Nasr对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提供了有帮助的见解，尤其是关于慕尼黑的“黑色九月”行动。Romy Ruukel提供了非常需要的帮助和建议，校对文本并教我们如何编写参考文献书目。许多人在这个项目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他们不愿在这里透露姓名。我们同样感谢他们。

不用说，这些个人或团体都不可能同意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一切，他们也不一定赞同我们得出的结论。同样，他们对这里所包含的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

最后，我们开个玩笑，要感谢美国军队创造了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项目就不可能完成。

译者的话

在准备这些文本时，我们查阅了许多现有的法语和英语版本。然而，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翻译都被发现有严重的缺陷。不足为奇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那些对德语掌握有限的坚定的活动家们的工作成果，都被错误的翻译给毁掉了——考虑到德语的复杂性，这些错误通常是可以预料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原始文本的一些片段在可用的翻译中被发现缺失。遇到可能最好称为音译的情况也很常见——译者“调整”概念以适应他或她翻译文档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后一种现象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无论多么无意，对原始文件的意识形态的曲解——通常只是性质上的轻微曲解，但有时也是恶劣的。也许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我们提到的翻译文献中有增词现象；通常只有一个短语或一两句话，但有时是整个段落。

几个月来，我们仔细研究了现有的译文，希望能把它们修改成可出版的形式（本书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文件是我们能找到的两种语言的某种形式的翻译），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希望使用的所有文件在出版前都必须与原件进行核对。然后寻找原件的任务开始了，这一过程因为几个现存的网上资源而方便多了，其中包括前RAF囚犯罗纳尔多·奥古斯丁维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网站。1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名为Nadir2的网站上发现了完整的ID-Verlag的1997年的书籍，*Tex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RAF*。有了这两种资源，我们就有了完成这本书所需要的所有文档，除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一小部分。

我们使用的翻译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这两位“翻译”中只有一位精通德语，所以准备翻译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一旦一份文件被翻译出来，他就会把它转发给另一位“译者”，后者会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并提出改进（去德语化）所使用的英语的建议。这些建议——数量总是很多——之后将与原文进行核对，以确保意图没有被扭曲。在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版本出来之前，翻译人员之间通常要把文件交换两到三回。有三次，每次都是一句话，我们对对方的提议都不满意，因此必须达成妥协——这总共会影响到你手中这本书的大约半页。最终的结果是，这本书中所有文件被检查了至少三次，大多数主要的文件被检查了至少五到六次。

我们是在说这些翻译是完美的吗？肯定不是。在这样宏大的项目中，牵涉到四五百页的翻译，我们所做的决定之间和我们得出的解释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它们都不算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本书中的文件准确地反映了红军派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为读者提供了英语中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资源。

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把这部著作称为红军派的全部文本。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全部”是什么意思。据我们所知，我们已将RAF近三十年历史中印发的每一份文件列入本卷（1968-1977年）或即将出版的第二卷（1978-1998年）。我们指的是每一份理论宣言，每一份伴随着行动的公报，以及组织发给媒体的每一封信。

经过一番讨论后，我们决定不把豪斯特·马勒的《西欧武装斗争》（*über den bewaffneten Kampf in Westeuropa*）包括在内。这份1971年的文件是一份杂乱无章的理论文本，遭到RAF其他成员的拒绝，并且在该组织开除马勒的决定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马勒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公开开除的成员。（有兴趣的精通德语的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网上找到这份文档，它被包含在前面提到的ID-Verlag那本书。）

我们也没有包括被狱中RAF成员写的信，除了几个例外。实际上，彼得·巴克·舒特，RAF囚犯曾经的辩护律师，已经从信件中挑选了几千封，编辑成了一本叫*Das Info*的书并出版。在奥古斯汀维护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巴克·舒特对Stammheim审判的宝贵历史分析（文章简称为*Stammheim*）也能够在上面找到。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外，我们也没有出版多年来由RAF被告人发表的数百份法庭声明，它们通常都很长。当我们确实选择发表一封信或一份法庭声明，这是因为相关的文件填补了RAF历史中的某个理论或历史方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在其他地方很好的解决。我们在这一卷中出版的RZ（Revolutionary Cells，革命细胞）给RAF的公开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RAF给德国和欧洲其他游击小组的类似文件也会出现在第二卷中。

序

你手中的这本书，连同它的配套卷，组成了迄今为止用英语出版的最完整的红军派著作和历史。

红军派成立于1970年，当时一小群西德革命者决定转入地下，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行动。在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最初的成员不是死了就是被抓了，但是后者作为囚犯所受到的残酷对待为他们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并且他们自己不屈不挠的反抗为他们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

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抓住了西德青年一代的想象力。当然，在他们倒下之前，他们已经成功地鼓舞了其他人去拾起他们的旗帜。

事实上，在近30年的时间里，随着激进分子接连不断的扩大斗争，对西德统治阶级的关键成员和驻扎在联邦共和国的美国武装部队进行逐渐老练和大胆的暗杀和爆炸袭击，红军派一直都是德国政治中的一个因素。他们不止一次动摇了整个社会的核心，诱使统治阶级做出令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也感到震惊的独裁反应。最终，红军派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恐怖主义”的象征，但就像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一样，它从来都不是它所代表的东西的典型。

在和平时期，许多人认为游击队是合法的政治力量，人们可以看到足球球迷戴着红军徽章的报道，年轻人偷偷地把从通缉海报上剪下来的照片放在钱包里。随着这段天真而浪漫的蜜月期逐渐过去，这个团体成为了集体仇恨和歇斯底里的对象，变成了事情走得“太远”、人们“失去道德指南”的骇人例子。

就像任何强大的符号一样，在红军派的历史中，人们对它的看法似乎是最重要的。对许多人来说，对该组织的兴趣源于对其创始成员的极大兴趣。20世纪60年代，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已经是一位知名记者，她似乎能够将激进的政治与日益成功的职业生涯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安德里亚斯·巴德尔以柏林时髦圈子里的迷人流氓而闻名，当他和一群朋友因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实施燃烧弹袭击而受到审判时，他的魅力变得更强了。

人们可能不认同他们接下来做了什么，也不认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至少这个被误称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组织有自己的风格。随着媒体渲染每一个细节，掌权的老家伙们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因为是最顽固的城市游击队而受到了人们短暂的喜爱。

关于这种奇怪的魅力，这种游击队的声望，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这样做就等于写了一部文化史，而我们想要的是其他的东西。

除了顺带一提，这些书不会涉及RAF的私生活或个性。游击队成员如何与他们的父母、朋友或彼此相处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我们不会关注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车，他们对音乐的品味，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童年。们不会去猜谁是“好人”，谁是“混蛋”，也不会去查谁和谁睡过觉，也不会去查人们吵架时互相叫的名字。

不得不提供这样一个否认声明似乎是荒谬的，因为大多数政治史都会忽略这样的细节。然而，对有关RAF的少数书籍进行一项简短调查，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接触过这一主题的人，都会把这些问题当作主要关注点。我们也不是没有注意到，红军派囚犯自己也会在不止一次的场合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从心理角度解释他们的行动是一种有意识的国家策略的一部分，这种策略将其政治活动及其本身归因于一种病态，或至少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琐碎的或常常是捏造的个人细节上。虽然在对红军派更广泛的分析中，我们认为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分析看起来百分百正确。

虽然个人可能是政治的，但我们相信，RAF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它在其成员或支持者的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反，要理解它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作为能够评估其实践的第一步，RAF必须被置于左翼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在第一世界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因此，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该组织的思想，它在其公报和其他文件中确立的路线，它如何通过其行动和运动将这条路线付诸实践，以及该组织与其支持者和其他左翼分子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可能会指责我们不加批判，甚至支持RAF的政治和他们的做法。我们会回答，为了有所批判，一个人必须首先占据事实。尽管我们认为关于道德、手段和目的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因为这是英语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宁愿不对游击队的每一步进行批评或赞扬而把事弄乱。

当然，我们不会指责一切，也不会一味地赞扬。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红军派而撰写的东西充满了评判，往往很少包含事实内容或政治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书籍为纠正这种不平衡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为了使游击队的行动和言论可以被完全理解，他们需要被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西德更广泛的左翼运动的背景下。尽管当时这些事件正在展开，但在北美，我们许多人对这一背景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点更加难以理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提供了两个背景章节，提供战后西德的概况，以及对游击队不同文件的一系列文字介绍。这些是概述，而且很明显，它们都是从某一个特定角度撰写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分析最为明显地与RAF的分析相左，尽管我们同情它的许多目标。

我们把这些文件提供给今天的同志们，也提供给明天的同志们，既是对那些曾经奋斗过的人们的证明，也是对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的一种解释。

首字母缩写词

2JM Bewegung 2. Juni（6月2日运动），于1972年初成立的柏林无政府主义游 击队，它的名字来源于1967年警察枪杀抗议者Benno Ohnesorg的事件。

APO Auferparlemtarische Opposition （Extra-Parliamentary Opposition，议 会外反对派）；这个名称是指广泛的激进反对派，其根源在学生运动中，包括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左翼反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运动。

ARD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o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anstalt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国家资助的广 播。

BAW Bundesanwaltschaft（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积极起诉游击队和左翼分子 而闻名。

BGS Bundesgrenzschutz（联邦边防巡逻队）；边境安全警察。

BKA Bundeskriminalamt（联邦刑事局）；相当于德国的联邦调查局，在打击游击 队和左派的警察活动上尤其活跃。

BND Bundesnachrichtendienst（联邦情报局）；联邦德国的国外情报机构。

CDU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s Union Deutschlands（德国基督教民主联 盟）；德国主流保守党。

CSU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巴伐利 亚州的主流保守党，基民盟在巴伐利亚州的合作伙伴。

DGB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德国工会联合会）；联邦德国中最大的工会 联盟。

DKP 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德国共产党）；1968年成立的亲苏共产 党，实际上是重新命名了1956年被禁止的德国共产党。

FAZ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法兰克福汇报》，一份高质量、全国 性、温和保守的德国日报。

FDP Freie Demok ratische Partei（自由民主党）；德国的主流自由党。

GIM Groupe Internationale Marxisten（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托洛茨基第四 国际组织的德国分部在70年代和80年代活跃于FRG，于1986年与KPD/ML 合并形成VSP。

GSG9 Grenzschutzgruppe 9（第九边防大队）； 表面上是边防卫队的一部分，实际 上是德国的反恐特别行动组。

KB Kommunistischer Bund（共产主义联盟）；一个活跃于70年代的毛主义小 组织。

KBW Kommunistischer Bund Westdeutschland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1973年 在不来梅成立，一个最初与中国有联系的毛派组织后来转而支持阿尔巴尼亚 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政权，在1985年解散。

KPD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共产党）；一个亲苏共产党， 成立于1919年， 1933年在希特勒和1956年在阿登纳的统治下处于被取缔 状态，1968年更名为DKP（德国共产党）。KPD同样也指一个由KPD/AO在 1971年建立，1980年解散的毛主义党。

KPD/AO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Aufbauorganisation（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Pre-Party Formation，德国共产党/预备政党组织）；一 个1970年成立的毛主义政党，在1971年成为KPD。

KPD/ML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Marxisten-Leninisten（德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毛主义党，成立于1968年12月31日。它在1986 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GIM融合形成了VSP。

KSV Kommunistische Studentverband（共产主义学生协会）；KPD/AO学生组 织，1971年成立，1980年解散。

ID Informationsdienst；一个从1973年到1981年每周出版新闻的左翼机构。 1988年，它的档案被用来创办左翼出版商Verlag Edition ID-Archiv， 专门出版关于德国极左势力的书籍。

LG Landesgericht（地方法院）；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院系统。

LKA Landeskriminalamt（土地刑事局）；相当于在州或省一级执行职务的BKA。

LWA Landesanwaltschaft（州检察官办公室）；相当于州或省检察官办公室。

*NPD* 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国家民主党）；极右翼政 党，得到许多新纳粹分子的支持。

OLG *Oberlandesgericht*（地方上诉法院）；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地方上诉法院。

ÖTV *Gewerkschaft dffentliche Dienste*， Transport und Verkehr*（公共服 务、交*通和通信联盟）。

PFLP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立于1953年，世俗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法塔 赫后巴解组织内第二大派别。

PFLP(EO)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外部行动）；最初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的一部分，在 70年代初期因在以色列以外进行有争议的行动而被驱逐，1978年，该组织领 导人瓦 迪·哈达德（Waddi Haddad）被摩萨德毒死后实际上解散了。

RAF Rote Armee Fraktion（红军派）。

RH Rote Hilfe（红色援助）；来自APO的一个重要的囚犯支援网络。

RH E.V. Rote Hilfe e.v.（红色援助注册协会）；1970年KPD/AO成立的红色救助网 络。

RZ Revolutiondre Zellen（革命细胞），成立于1973年，其组织中的大部分小 组于1991年停止活动，最后的行动发生在1994年。

SDS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 到60年代末，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左翼学生联合会，也是APO中最重要 的组织。它于1970年解散。

SHB Sozialdemokratischer Hochschulbund（社会民主学生联合会）；由社会民主 党于1960年成立，1992年解散。

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的主 流社会民主党。

SPK Socialistiches Patientenkollektiv （社会主义患者集体）；成立于1970 年，是反精神病学运动的一部分。1971年，在极端的国家压力下，它解散 了，许多核心成员后来加入了红军派。

VSP *Vereinigte Sozialistische Partei*（联合社会党），由KPD/ML和GIM于 1986年合并而成，1993年分裂成不同的群体。

ZDF *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德国电视二台）；德国公共管理的电视公 司，欧洲最大的广播公司。

德语术语

这绝不是本卷所使用的德语词汇和术语的完整列表，其中大多数已在正文或通过脚注的方式加以解释了。以下是一些读者会经常遇到的单词。

Bundestag: 西德联邦议会。

Bundeswehr:西德武装力量，1954年重建。

Jusos: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Jungsozialistinnen und Jungsozialisten in der SPD (Workers Association of Young Socialists in the SPD，社会民主党青年团)；社民党的青年部分。

Kripo: Kriminalpolizei（刑事警察）的缩写;德国主要的警察部队。

Land/Lander: 德语中相当于州或省的单/复数形式。

Ostpolitik: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集团的官方政策。

Rote Zora: RZ的独立女权主义附属机构。它的成员最初在1975年作为“革命小组妇女”（the Women of the Revolutionary Cells）而活跃。最后一次Rote Zora行动发生在1995年。

Stasi: The Ministerium fu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史塔西，它是东德的秘密警察部队，负责追踪内部异议和外国威胁。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FBI或BKA，但在政策决策中扮演了更核心的角色。

Verfassungsschutz: 字面意思是“宪法的保护”或宪法的保卫者；联邦宪法保卫局，德国内部情报部门，针对游击队和左翼情报行动的主要警察力量。

PROJECTILES

for the

PEOPLE

x

# “民主”来到德国：后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的持续魅力

如果不了解联邦德国这个国家的性质，不了解它在二战后美国制定的霸权反共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新左派的崛起，也**不可能真正**理解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德武装斗争的发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混合的国家，它的一些元素——它的制度，一些法律，许多人员——无缝地延续了纳粹时期，还有一些是美国人移植过来的。西德几乎从宪法上被定义为美帝国主义的次要合作伙伴，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西德一直处于美帝国主义的从属地位，就连英国或法国也不是这样。更糟糕的是，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美国给予了西德的统治阶层和专业人士阶层为保留自己令人窒息的保守的和专制的后纳粹文化和身份而讨价还价的自由。

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种族灭绝后的基础上；死去的犹太人仍是角落里的大象，或者被视而不见，或者被解释为希特勒统治下“缺少道德”的悲剧后果。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人私下里不会认识任何犹太人，只会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降临到犹太人身上的恐怖：这是这样一种痛苦的证词，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对凶手怎么辩解和忽视他们的缺席无法有任何发言。

起初，1945年5月纳粹主义的失败似乎意味着德国国家主权的终结，其西部被法国、英国和美国占领，东部被苏联占领。

在这个最终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苏联占领地区，统一社会党(SED)掌握了政权。苏联和其他东欧集团国家在德国的战争中首当其冲，因此，多年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建工作一直排在赔款之后。在东德的整个存在过程中，它具有许多“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东德没有那么多的赤贫和对第三世界掠夺的参与；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异议或抗议的余地。即使是被怀疑与主流政党路线不同的共产党人，也可能被秘密警察史塔西逮捕和拷打。社会和文化没有被冻结，但它们确实被降温了，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社会主义”式的保守主义。

然而，不少毕生都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但可以接受的代价，以束缚德国的侵略，而德国的侵略刻画了半个二十世纪。正如马库斯·沃尔夫，本书所述时间段内史塔西的可怕领导人，在柏林墙时代结束后（post-wall）他的辩护词中解释的那样：

*我们东德社会主义者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这种社会永远不会重蹈德国过去的覆辙。最重要的是，我们决心不让战争再次起源于德国的土地。*1

在西部地区，美国最初也曾考虑过让这个国家去工业化，以削弱它的发展，并阻止德国在未来发动战争。然而，这种方法很快就被否决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7年6月的指令指出：“一个有秩序的和繁荣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而富饶的德国做出经济贡献。”

福特、通用汽车、大通曼哈顿银行、IBM和标准石油等公司战前在德国进行了巨额投资，并都在游说德国尽快恢复一切正常，这些都没有伤害到它们。2

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始终是西方占领国之中的首要目标，再加上德国中上层阶级的利益，有效地破坏了西方去纳粹化的任何真正努力。没过多久，曾经帮助维持第三帝国的重要部门都被欢迎进入新的亲美政府。正如已故的William D. Graf所说：

*1945年被美国基尔戈尔委员会(*Kilgore Commission，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军事动员子委员会-译注*)列为战犯的大企业代表，到1948年几乎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在1945年因纳粹历史而被解雇的大约5.3万名公务员中，只有大约1000人被永久地排除在外，而司法部门人员早在1946年就几乎100%地恢复了。*3

结果，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明显右倾的政治体系。这一时期标志着美国与苏联集团的“冷战”的开始，德国在其中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筹码。遵循杜鲁门主义，西方盟国占领的区域被建立为反共产主义的堡垒。实现这个项目的载体是欧洲救援计划，这是西欧经济和军事重建的蓝图，1948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计划。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西德获得了近15亿美元的资金，其经济得以重建，以确保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扩大，为西欧在军事和政治上融入反共产主义阵营奠定基础，并促进欧洲社会在文化和技术上的美国化，尤其是西德本身。4

1 Markus Wolf and Anne McElvoy, *Man without a Face: The Autobiography of Communism’s Greatest Spymast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9), xi.

2 Charles Higham,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n Exposé of the Nazi-American Money Plot, 1933-1949*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83).

3 William D. Graf, “Anti-Communism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社会主义年鉴》(1984): 167.

4 Women Against Imperialist War (Hamburg), “War on Imperialist War,” in Prairie Fire Organizing Committee, *War on the War Makers: Documents and Communiqués from the West German Left* (San Francisco: John Brown Book Club n.d.), 21

简而言之，在战争和社会经济混乱中被摧毁的西德得到了重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融入同盟集团的机会，作为交换条件，西德向国际资本主义提供支持，并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利用其领土作为前线阵地。这一呼吁不仅针对统治阶级，也针对“普通”德国人，这些德国人可能从第三帝国的掠夺和种族灭绝政策中受过益，但现在他们失败了，发现自己经济陷入了动荡。1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亲苏政变几周后，西方占领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早期的宣传文件，解释了这个紧要关头：

*马歇尔计划的命运将决定谁将在民主与极权主义的重大意识形态冲突中胜出。除非德国人能有足够的食物和像样的房子住，否则再多关于民主好处的花言巧语和再多的镇压也阻止不了他们走向共产主义。*2

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他们个人不太臭名昭著或者不愿意遵守新规则的话，纳粹分子似乎比共产主义者或者他们设想的同路人更受欢迎。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对于西德的大多数当权者来说，“反共提供了他们与西方战胜国共同事业的一个起点，因此……是一种避免被指控与希特勒政权勾结的手段”。3

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在1949年被授予半主权国家地位时，这一共同利益已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中得到体现，该联盟处于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铁腕之下。基民盟执政近20年，通常与规模小得多的自由民主党(FDP)和巴伐利亚稍微激进的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组成联盟，很快就几乎成为了国家本身的同义词。

1 过去三十年里，关于非犹太的德国工人阶级如何从德三统治政策中获益，享受工人贵族的地位，人们写了很多。这个主题下最值得注意的书是Götz Aly的*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translated by Jefferson Chase, 1st U.S. 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7).

2 “How to Fight Communism”, March 25, 1948, OMGUS（美国军事政府办公室）编写，援引自 Patrick Major所著的*The Death of the KPD: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in West Germany, 1945-19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247.

3 Graf, “Anti-Communism”, 169.

模范资本主义

西德将不仅仅是抵御“入侵的红色威胁”的盾牌；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经济和社会上“有进步性的”资本主义的可见模式。“德国模式”(Modell Deutschland)，被其他西欧国家视为榜样，也被视为对“墙”另一边的工人阶级的嘲讽。

作为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展示品，西德很快以一种历史悠久的资本主义方式为自己买单——这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那些最绝望、最受压迫的阶层。

高度的剥削加上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财政援助，使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羡慕的对象。从统治阶级的每一个衡量标准来看，西德的经济都是耀眼的。1948年至1958年期间的实际工资水平是法西斯政权时已经确立的水平4，大约比美国工人的工资低25%，5而1955年的每周工作时间可能高达50个小时，钢铁等关键产业的工作时间可能更长。那一年，西德的工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比英国工人长2.5小时，比美国和加拿大工人长8小时。6

The profits made possible by this arrangement encouraged an ex- tremely high rate of investment, which grew from 19.1% in 1950 to 26.5% in 1965; even with the recessions of the seventies, it wasn’t until 1976 that it had fallen back to 20%. In 1960, when France was show- ing a rate of investment of 17.4% and both Britain and the U.S. only registered 16%, West Germany was already showing an investment rate of 24%

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利润鼓励了极高的投资率，投资率从1950年的19.1%增长到1965年的26.5%。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利润鼓励了极高的投资率，投资率从1950年的19.1%增长到1965年的26.5%;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投资率也一直到1976年才回落到20%。1960年，当法国的投资率为17.4%，而英国和美国的投资率仅为16%时，西德的投资率已经达到了24%。7

4 Werner Hülsberg, *The German Green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file*. Translated by Gus Fagan. (London: Verso, 1988), 22.

5 Karl Heinz Roth, *L’autre movement ouvrier en Allemagne 1945-78*. Translated by Serge Cosseron. (Paris: 6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79), 50.

6 出自Hülsberg, 22-3.

7 同上, 23.

如维尔纳·胡斯贝格（Werner Hülsberg）所言：

*“经济奇迹”仅仅表明存在着剥削雇佣劳动的理想条件，因此，这多少有点可疑的神话色彩。然而，经济的长期增长确实导致了西德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1950年至1962年期间，工资和薪水净额增长了143%，而独立企业家的收入同期增长了236%。*1

这种繁荣也是基于工人阶级的实际分化，德国壮年男性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获得比“贱民阶层”（“pariah layers”）更高的薪水，“贱民阶层”包括年轻和年长的德国男性，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移民和女性劳动力的基础上的。

德国战败的直接后果是，工人阶级女性首当其冲，承受了无偿的、不记名的重建工作，但这对于生存是绝对必要的，以至于“*Trümmerfrauen*”(“废墟中的妇女”)一词被创造出来，用来形容那些徒手拖走被炸毁建筑废墟的妇女。与此同时，1945年10月，盟军管制委员会宣布，所有15岁至50岁的女性都有义务在官方经济中工作: 在纳粹统治时期，男性收入1美元，女性劳动力的收入仅为86美分，而现在女性的相对工资却在下降，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女性的工资平均只有男性的60%。2

在整个1950年代，70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其中许多是高技能人员，从东部源源不断地涌入西德。纳粹时期，德国的工业是围绕着使用强迫劳动而建立起来的，但很快他们发现可以用移民劳动力填补这一空白。

正如新左派历史学家Karl Heinz Roth从大企业的角度所评论的那样，“这个流动性极强的下层无产阶级完全补偿了纳粹时期被迫从事强迫劳动的奴隶的损失。”3然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之处：与在纳粹统治下被活活累死的奴工不同，这些新移民得到了极大的优待。在统治阶级的眼中，他们是绝对忠诚的，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因为他们来自“共产主义东方”，当纳粹占领结束时，他们中有不少人失去了作为德国人的真正特权。的确，这些来自东方的被驱逐者和难民受到剥削，但他们自然的会被最恶毒的反共阵营所吸引，并在工人阶级内部激发了工厂工人（shopfloor）和草根阶层对左派的抵触。4

这一最初的廉价劳动力浪潮是由其自身的政治同情者所严格控制的，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外来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政治上活跃于左派，因此受到更大的外部管制和控制。随着劳动力的来源从东欧转移到南欧，这些工人在入境前会受到政治审查，如果被认定为“制造麻烦的人”，就会被驱逐出境。

因此，在德国工人阶级受到高度剥削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这样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的特权阶层会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被压迫阶层的政治取向。

再次引用Hülsberg的话: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西德工人阶级融入资本主义制度和丧失政治力量的悲剧。阶级斗争被“美国生活方式”所取代。甚至摇滚乐之王猫王在德国服兵役时也向它致敬……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安慰。*5

1 同上, 24页.

2 同上, 22页.

3 Karl Heinz Roth, 47页.

4 Patrick Major, 174, 192页.

5 Hülsberg, 25页.

**

西德一家装瓶厂的希腊工人：到20世纪60年代末，女性几乎占到了西德所有“外来劳工”的三分之一。

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等级制度在其所谓的机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SPD)内部产生了共鸣。

在联邦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里，各个工会由同盟国的胜利者们重新组织，其明确的目标是避免资产阶级最害怕的“经济混乱”。这些工会把注意力集中*Mitbestimmung*(联合管理，工人在公司董事会中有一些象征性的代表)，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官方的劳工运动将继续对革命政治抱有敌意。这种堕落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工会成员组成了“工厂民兵”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工作是镇压自发的罢工和不守纪律的工人1，一名外国记者在一篇关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文章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工会拒绝要求更多的钱时，一个国家要怎么办？”2

作为对这一可悲政治轨迹的补充，社民党“率领阶级意识较弱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其纲领“在战后时期是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并以毫无意义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宣言作为点缀。”3左翼工会成员被开除党籍，社会主义报纸《另一家报纸》4（*Der Andere Zeitung*）的编辑也被开除党籍，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利用其作为官方反对派的地位，一再误导和破坏任何来自基层的反抗。

社民党和工会领导人都没有兴趣弥合他们(特权日益增加的)基层和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贱民阶层”之间的鸿沟:

*社会民主社团主义是一种凝聚企业和劳工组织中最强大利益的共识产生机制，它有意识地排除了较弱的因素: 外国人、妇女、青年和年长的工人，从而将阶级斗争转变为群体间的斗争，在从属阶级中没有减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福利主义。*5

当然，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经济项目：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是让西德也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前哨。这不仅体现在1949年几乎同时成立北约和联邦政府，而且体现在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性质上：在1955年西德被正式授予主权时，它当时的条件是允许西方列强在其边界内驻扎其武装部队，而在实现其新条约的四天之内，它就加入了大西洋联盟。6最重要的也许是，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北约的指挥官——通常是美国人——也会成为西德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正如颇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杂志《明镜周刊》(Spiegel)主编Rudolph Augstein在1955年所言:“新德国军队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障波恩的安全；相反，新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能够建立一支对抗苏联的军队。”7

结果是，西德在其领土上建立了100多个美国基地，其统治阶级急于在世界各地支持美帝国主义。这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1)为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共政权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2)代表西方建立对前殖民地的新殖民主义渗透；(3)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提供后勤支持。

这第一个角色的一些重要例子——作为政权压迫的中转站——包括西德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对葡萄牙法西斯萨拉查独裁政权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对自由战士的持续战争的支援，对杀害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凶手和对刚果的帝国主义干预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对以色列国，这个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新殖民滩头阵地的大规模财政援助（伪装成赔款)，以及对南越傀儡政权的经济支持。

1 Roth, 121页.

2 David Haworth, “Why German Workers Don’t Ask For Raises,”温尼伯自由新闻社, December 11, 1968.

3 Hülsberg, 25页.

4 Graf, “Anti-communism,” 183页.

5 William Graf, “Beyond Social Democracy in West Germany?”《社会主义年鉴》(1985/86): 118页.

6 “Die Integration der Bundesrepublik ins westliche Bündnissystem,”

http://www.kssursee.ch/schuelerweb/kalter-krieg/kk/integration.htm.

7 Women Against Imperialist War, 22页.

除了贷款、经济投资、军事销售,并最终核技术的分享,这些反动政权也将偶尔受益于德国士兵和雇佣军1的干预，包括SS老兵。2

将前殖民地卷入西方势力范围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发展援助”完成的，其中大部分是以向新成立的所谓“民族国家”运送武器的形式完成的。尽管这种援助经常被用来迫使新的民族国家加入亲美军事联盟，或者拒绝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它同样重要的只是作为一种维持和巩固西方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精英之间联系的手段。

到20世纪50年代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重要的“捐助国”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它提供的“援助”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任何西方政府。3考虑到它在几十年前就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西德相对这一角色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候选者，正如1963年《斯图加特报》(*Stuttgarter Zeitung*)所指出的:

*“为什么非洲国家转向波恩，而不是巴黎或伦敦这显而易见……他们转向一个没有被殖民主义败坏名声的国家。”*

或者，如同年美国的《华盛顿明星晚报》报纸所写：

*“西德已获大西洋联盟特别授权向非洲和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能如此胜任这些任务。西德没有殖民统治的污点。”*4

FRG第三个角色的主要例子是为美国军队提供直接支持，这就是遍布全国的许多美国军事基地。这既是对东欧集团国家的威胁，也为特别行动的提供了集结地。随着对第三世界目标的军事打击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联邦共和国的空军基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1 关于所有这些, 参见*The Neo-colonialism of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fro-Asian Solidarity Committee, 1965), 20-35, 39-45, 62-65, 82-85页.

2 Madeleine G. Kalb, *The Congo Cables: The Cold War in Africa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193页.

3 Frieder Sclupp, “Modell Deutsch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West Germany: Formation and Contents*, 由Ekkert Kruippendorf和Volker Rittberger编辑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0).

4 引自*The Neo-colonialism of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96-97页.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都通向莫斯科”: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选举海报，1953年。

美国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具有领土外的地位，并根据美国法律运作。当然，它们也是中央情报局干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欧的场所，不仅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也是为了对抗独立的左翼反对派。根据101-1号行动计划，美国驻欧洲总司令在法律上有权干预西德的内乱。此外，中央情报局还与前纳粹分子和新纳粹合作，建立了“留守”网络，一旦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掌权，这些网络就会进行恐怖袭击。5

宁死不赤

虽然“德国模式”的经济和军事方面或多或少都是在公共论坛上制定的，在某些情况下还面临公众的反对，但这个模范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一个从来没有被讨论过的方面，但它与这里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反共产主义，被称为西德社会的第三大支柱。6

我们将看到，这种反共产主义远远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更确切地说，西德“宪政民主”的法律体系从最早期起就旨在防止和/或消除所有革命的左翼反对派。于1949年生效的联邦共和国宪法《基本法》(Grundgesetz)确立了个人权利的法律基础。虽然《基本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通常具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但它却一再提出警告:这些权利可以从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敌人的人那里收回。

5 Daniel Ganser, NATO’s Secret Army: Operation Gladio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2005), 190-211页.

6 Hülsberg, 15页.

第18条明确规定了这一限制条件:：

*滥用言论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第5条第(1)款)、教学自由(第5条第(3)款)、集会自由(第8条)、结社自由(第9条)、通信、邮电通讯的隐私(第10条)、财产权利(第14条)的人，或庇护权(第16条a款)以反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的人，将丧失这些基本权利。这种没收及其范围应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布。*1

对第21条的限制，即限制成立政党的权利，加到了这一本来就不祥的规定之上：

*任何政党，出于其目标或其追随者的行为，企图破坏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或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均属违宪。联邦宪法法院应对违宪问题作出裁决。*2

这几段是政治不稳定的经历所赋予的，这些经历给魏玛共和国带来了创伤。他们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止未来发生此类动荡的愿望。一些观察人士对为防止纳粹主义再度抬头而限制政治自由给出了进一步的合理解释，但这种轻信的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被这些法律排除的主要目标是左派。

1951年，基民盟进一步加强了镇压的法律框架，通过一系列国家安全立法，明确了以下五种罪行：叛国罪、危害国家、违反宪法机关、对抗当局政府、违反公共秩序。3司法部长托马斯·德勒（Thomas Dehler）解释说，这些法律将被用于打击“意识形态叛国罪”、“意识形态颠覆”和“意识形态颠覆破坏”，简言之，思想罪。4

所有这些法令和宪法限制的直接目标在一阵忙碌后很快就明确了。1951年11月23日，联邦政府根据《基本法》第21条，向宪法法院申请取缔KPD。当时该党在联邦议院拥有15个席位。

共产党一直反对加入北约，直到1952年还在口头上支持推翻阿登纳政权的革命。该党显然没有得到大众的政治支持——它在1952年的选举中只获得了2.2%的选票5——然而，KPD作为唯一一个为主流政党所无法代表的一些民众利益大声疾呼的政治机构，却构成了一个潜在的麻烦：

*它继续倡导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阵线，反对重建武装和原子弹，抵制如限制言论自由和《紧急状态法》等威权主义趋势，这些都是许多团体的共同目标，包括现有政党中被忽视的利益。显然……败坏KPD的名声，甚至将其定罪，也会削弱所有与之有共同目标团体的吸引力。*6

1 German Bundestag, Administration, Public Relations section,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lin, 2001), 22页.

2 同上, 23页.

3 Sebastien Cobler, *Law, Order and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78), 76页.

4 同上, 74页.

5 Wolfgang Abendroth, Helmut Ridder and Otto Schonfeldt为编辑, *KPD Verbot oder mit Kommunisten leben* (Hamburg: Rororo Taschenbuch Verlag, 1968), 38.

6 Graf, “Anti-communism,” 179页.

对KPD的审判开始于1954年11月11日。意识到事态发展的方向，KPD在1956年初的公开声明中与革命政治划清了界限。但为时已晚：当年8月17日，KPD被宣布为非法。不仅是党员，还有他们的家人、被指控为前线组织的成员和任何有同情共产主义嫌疑的人都成了目标，一个机构被全面建立起来，对所有这些个人和组织进行监视。1

镇压KPD只是更广泛的宪法镇压过程中最明显的一环。1954年8月2日，最高法院裁定：组织和推动示威、集会和罢工也可构成叛国罪。几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罢工中任何超出停止工作和违反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行为，都不能被所谓的罢工法所证明是正当的。”21955年，全面禁止一切政治罢工，进一步确定了《基本法》的本质。3

与此同时，Dreher的新安全措施得到了充分利用。到1960年代，数以千计的叛国罪案被提交到法院:

*1963年，对被控犯有这种或那种叛国罪的人采取了10322次行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动针对不只一个人。1961年，共有442人因各种“叛国罪”而被判刑。诚然，其中36人只被处以罚款，212人只被处以9个月至5年的监禁，5人被处以5至15年的监禁。其他的很多人职业生涯也因为政府未能证明自己的罪行而毁于一旦。*4

随着文化的绝育和工人激进传统的破坏，这个后法西斯主义、后种族灭绝的社会为一个新威权主义和技术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理想的基础。

1 同上, 180.

2 Cobler, 183-184.

3同上, 80.

4 David Childs, *From Schumacher to Brandt: The Story of German Socialism 1945-1965*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66), 49.

模范所不需要的：KPD

战后，KPD得益于明确的反纳粹历史记录，但由于各种因素，这一强势地位迅速瓦解。华威大学的Patrick Major在他的著作*The Death of the kpd: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in West Germany, 1945-1956*中对这种衰落进行了有价值的概述。

根据Major的说法，战后的党领导层发现自己经常与更激进的普通党员发生争执。由于许多工人阶级的不满都是针对占领国的，其中之一就是苏联，所以它与它的所谓的支持者——无产阶级——进行联系的处境是很差的。事实上，正如Major指出的那样，“最早支持罢工的人往往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德国共产党人像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把重建国家放在工资增长或者甚至是去除纳粹化的管理之前。”5

该党与执政东德的统一社会党(SED)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该党的实力。社会主义统一党鼓励KPD的保守倾向，坚持优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反对西方占领者的进步反对派，把阶级斗争放在次要位置。他们不仅希望能够从帝国主义手中撬下来“西部地区”，而且还意识到KPD的主要竞争对手——SPD——正在通过其“煽动民族主义乌合之众”来赢得支持。6

在这个爱国策略为主的时期，反资本主义的言论被淡化了。在一些州，党员被要求停止在公开场合演唱《国际歌》，锤子、镰刀和苏联红星的标志也从他们的活动行头中被移除。7让从第三帝国下幸存过来的许多同志感到恶心的是，KPD甚至一度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的国民阵线，吸引中产阶级分子、爱国资本家，甚至前纳粹支持者。1

尽管KPD在1956年被取缔，但这种可疑的“反殖民主义”代表了真正的阶级力量，以及相当一部分进步的观点。这些姿态并没有为共产党赢得任何重要的民族主义支持，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在未来反对重建武装和核武器的运动中依然可见。尽管这些运动中绝大多数都是左翼分子，但它们仍然能够吸引（并接受）保守派甚至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反对融入西方集团，认为这是“不爱国的”。

随着冷战的降临，与东德统一社会党的联系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负担：当西边的共产主义者在FRG反对重整军备时，他们不得不为GDR的重整武装找借口；当他们谴责西部剥削性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不得不为东部的计件工作制政策辩护；当他们抱怨美国人对FRG的“殖民”时，他们不得不对GDR并入苏联集团一事保持刻意沉默。

尽党在明确反对阿登纳政权专制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战斗，不仅因为右翼的镇压，还因为西部地区斗争的要求与东部地区的统治相矛盾。

1 如上，133.

2 如上，26.



# 革命政治重现西德

在希特勒政权之前的几年里，德国是欧洲最强大、最激进的左翼运动之一的发源地，其坚实的基础是德国庞大且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巴伐利亚和鲁尔地区发生了起义，如果不是因为左翼的（had it not been for errors and betrayals on the left）错误和背叛，许多人仍然相信，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成功地孕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20世纪。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事件的发展，曾给几代欧洲社会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左翼，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中遭到重创，被迫流亡，沦落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或被扭送进集中营。

战后，当有组织的左翼机构重新出现时，它们无法克服自己的历史弱点，而这些弱点又被同盟国的腐化和镇压政策主动加强了。那些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形成的少数独立反法西斯团体很快发现他们自己被禁止了，成为了闯入胜利者计划内的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同盟国的这种对任何工人自主的或反法西斯的反叛的镇压构成了去纳粹化把戏不为人知的一面。

任何真正的左翼反对派在德国分裂后的几年里继续变得黯淡。作为德国统治阶级与美帝国主义联盟具体表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帮助实施马歇尔计划和立法对抗任何左翼激进主义复苏的过程中，几乎没遭到过反对。

然而，尽管马歇尔计划在政治方面的实施并不困难，但重新武装西德(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遭到强烈反对就不足为奇了。

在刚刚结束的战后时期，西德人强烈反对重整军备。到1952年，这种情绪已经聚集成一场广泛的运动，包括尚未被取缔的KPD、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体、新教团体1、和平主义者，有时还有SPD的部分成员。这个进步联盟的右边是少数民族主义者甚至有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反对重新武装将国家扎根于西方集团中的道路。2尽管如此，这场被称为“不要美国的运动”(Without US Movement)是一场主要由左翼主导的混合运动。这是新联邦共和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运动，3尽管回顾起来可能显得怯懦无能，但它代表了当时战后共识的真正突破。

阿登纳政权的回应揭示了基民盟民主的局限性：1951年，KPD在这个问题上的公民投票倡议被禁止，因为根据《基本法》只有联邦政府有权举行公民投票。共产党决定不管怎样都要继续下去，他们在街角、报纸上的调查问卷和民众聚集的地方进行民意调查。“公投”与其说是一项科学的研究，不如说是一种煽动；例如，在Celle镇的一个电影院里，有一篇报道说，就在故事片结束时，一位热心的民意调查员要求所有反对重整军备的人站起来——百分之百的反对被记录下来。毫无疑问，KPD最终发现有近600万西德人“登记”反对政府计划。4

不必多说的是，阿登纳并不觉得好玩，民调很快就变成了一项有风险的尝试：总共有7331人被捕，KPD的自由德国青年阵线（FDJ）小组仅仅因为参与了一场美化请愿的活动就被禁止。5

与此同时，像是为了让事情更清楚，1952年5月11日，警察袭击了埃森市的一次和平集会，先是用警犬和棍棒，然后是实弹。Philipp Müller是FDJ的一员，成为了新的联邦共和国示威活动中被杀害的第一人。为了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警察因Müller的死而面临指控，但11名示威者随后因行为不检和“违反宪法的叛国罪”被判入狱6年零4个月。6



Philipp Müller

1931.4.5-1952.5.11

1 Paul Hockenos注意到，对于一些新教徒来说，他们的宗教可能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战后的第一次抗议运动，因为在这个被截短了的新国家里，他们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在战前的德国，新教徒的人数几乎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而在FRG里，这两种宗教的人数大致相当。参见Paul Hockenos, *Joschka Fisch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Berlin Republic: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ostwar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 尽管如此，教会仍然压倒性地反对共产主义，对左翼政治充满敌意。

2 正如新纳粹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ocialist Reich Party）的一名代表所说：“起初我们被告知枪支和弹药是毒药，现在这种毒药变成了我们应该吃的糖果。但我们不是黑人或白痴，他们可以对那些人为所欲为。该送进疯人院的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 [Martin Lee, *The Beast Reawake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7), 65.]

3 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应该记住，在纳粹战败和德国联邦政府建立之间的那些年里，有一场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支持对该国最大的一些产业实行国有化。这场运动，最初似乎是顺风顺水，但遭到了盟军占领者的反对。当新的工会顺从地将其引向象征性的联合管理和去卡特尔化时，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因此，它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工人的政治活动甚至在占领结束之前就被他们假定的左翼代表所破坏。(Roth, 50-51; Hülsberg, 29-32; Childs, 67-84.)

4 Major, 145.

5同上, Hülsberg, 33.

6 Bernd Langer, *Art as Resistance*. Translated by Anti-Fascist Forum. (Göttingen: Aktiv-Dr. und Verl., 1998), 8.

镇压不是对抗刚刚开始的起义的唯一工具：误导也是统治阶级军械库中的重要武器。整个1953年，在不同的工厂有近100次罢工，抗议基民盟的重整军备政策。当参与政治活动的部分工人阶级积极反对阿登纳的计划时，SPD和工会领导层联合了起来控制事态发展。所有的精力都汇集到法兰克福的一个大型集会上。然而，主动权被从普通群众中移除，最终集会只是被用来为SPD争取支持1。随着基民盟无所顾忌的推进计划，社民党收回了组织支持，这个运动（现在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的基础）几乎立即消失了。2

由于最坚定的反对者被他们的“领导人”搞得混乱不堪，阿登纳政权轻易地通过1954年的巴黎条约批准了重整军备。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现了志愿兵役制、男性义务兵役制和战争物资的生产，进一步拉近了大企业与国家的关系。由于未能阻止这一切，反对派士气低落，开始瓦解。195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民众现在认为重新军事化是一项“政治必要”。3

对基民盟来说，重建军备就像《基本法》一样，只是联邦共和国获得“正常”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是西德融入帝国主义集团的一部分。尽管在这一时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权力被授予，但与我们的研究有一些关联的是1951年建立的联邦边防卫队（Bundesgrenzschutz）。在联邦内政部的管辖下，联邦边防卫队最初是一支一万人的准军事部队，其活动仅限于“边境地区30公里的范围内”。4

1951年，大多数左翼人士担心德国联邦边防卫队是建立常备军的迂回道路。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伎俩是没有必要的（尽管许多边防卫队将被纳入新的武装力量）。相反，边防卫队最终将成为国家半军事化警察部队的基础。

尽管有这些令人沮丧的开端，反军事化的情绪仍然很高，1956年，阿登纳政府积极回应美国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提议”，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自发的行动。1957年，西德第二大工会——公共服务、运输和交通工会（ÖTV）的成员以94.9%比例投票支持罢工反对拥核，这一呼吁得到了强大的德国金属工会（IG Metall）的主席的响应。在汉诺威，4万人示威反对核武器，在慕尼黑有8万人，在汉堡有12万人走上街头。5民意调查显示，52%的人支持反核武总罢工。

1 Hülsberg, 34.

2 Hockenos, 42-3.

3 Nick Thomas, *Protest Movements in 1960s West Germany: A Social History of*

*Dissent and Democracy* (New York: Berg, 2003), 33.

4 Cobler, 134.

5 Thomas, 35.

SPD和工会高层通过将运动从街道和工厂转移到投票箱，提议进行全民公投而不是大罢工，来平息这场失控的群众运动。不出所料，政府在宪法法院对这项公投提案提出了质疑，宪法法院在1958年裁定这项提案违宪。

这一策略奏效了，势头被打破，反核武器运动进入了一个急剧下滑的时期。在未来数年，它唯一可见的遗产将是每年复活节周末举行的和平示威，即所谓的复活节游行。与西德左翼的未来历史，特别是我们的故事有很大关系的是，与社会民主党声名狼藉的诡计形成鲜明对比的它自己的青年部门：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SDS)。

SDS成立于1946年，是培养未来党内精英的训练基地(西德未来的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是该团体的第一任主席)。然而，在反重整军备运动的背景下，一个转变开始发生，在1958年的会议上，明显偏左的社民党人赢得了SDS的领导地位：

*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发展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他们想建立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而SPD已经放弃了这个运动。SDS会议的决议是对社民党领导层的“宣战”。首先，SDS确立了反帝国主义立场，要求阿尔及利亚人民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要求法国殖民军队撤出。在此之后，SDS代表会议反对核武器，支持民主，反对军国主义。SPD强烈谴责这一事态发展。*6

1960年5月20日，为了对抗这种左倾倾向，忠于社民党领导层的学生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学生联盟(SHB)。1961年10月，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了社会主义促进协会(SF)，回应了这一右翼的举动。社民党领导层无法消除这种日益增长的左翼反叛，决定尽其所能将这一反叛孤立起来，肃清SDS和SF，此举在未来数年完全疏离了党内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HB自己也继续被拉向左翼，被迫跟随SDS的立场，直到它发现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被驱逐。）1

表面之下，事情正在酝酿，新一代发现自己在令人窒息、保守的德国模式下越来越悲惨。美国侨民Paul Hockenos描述了50年代围绕着这些年轻人的文化氛围：

*学校里的体罚……仍然是家常便饭，在大学里，如果学生打断课堂讲课，可能会被开除。联邦共和国仍有“婚恋法”（“coupling laws”），禁止21岁以下的单身男女在一起过夜，甚至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相处。允许孩子误入歧途的父母可能会面临法律处罚。与民主德国的学校课程（教会在其中没有发言权）对比鲜明的是，西德的学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性教育课程。*2

1 Graf, “Beyond Social Democracy,” 104-5.

2 Hockenos, 31.

**旧左翼和新现实**

在战后的占领政权中，在纳粹统治下流亡的各种知识分子回到了家乡，而其他保持沉默的人则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种更广泛的现象，尤其是两个群体脱颖而出：法兰克福学派和四七社。

1924年，在杰出成员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指导下，法兰克福商学院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员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知识性（intellectual nature）进行了批判，整合了来自社会学、哲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和知识严谨的理论平台，最终被称为“批判理论”。核心成员几乎都是男性，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包括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西奥多·阿多诺和于尔根·哈贝马斯。1933年，法兰克福学派被迁移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43年，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在此扎根。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战后选择返回德国时，许多其他人留在了美国。

四七社成立于1947年，旨在帮助那些经历过战争的新一代德国作家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写作技巧来反思纳粹的经历。主要成员包括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亚历山大·克鲁格、伊尔泽·艾辛格尔和艾利希·傅立特。几乎没有犹太人或妇女参与其中，而在德国人中，后来还发现有一些人曾是活跃的纳粹分子。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缺点，四七社还是确立了自己对战后德国文化的重要进步影响。

虽然他们最初可能都同情60年代的反抗，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很快就因年轻一代的目标、直接行动和暴力抗议的方式感到疏远。

讽刺的是，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了60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但它也提供了最强烈的负面反应，于尔根·哈贝马斯甚至指责学生激进分子与“左翼法西斯主义”调情。尽管因无法就学生暴动的意义达成一致，四七社急剧衰落，但它的一些成员仍然直言不讳地批评政治体制。特别是海因里希·伯尔和艾利希·傅立特继续谴责国家青睐专制的解决方案，哪怕这些方案跟与游击队的战争有关。

德特勒夫•克劳森(Detlev Claussen)后来参与了他那一代人的反抗，用他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试图让事情看起来好一些，但事情真的就是那么恶劣！那（对青少年来说——译注）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成长时期。”1

另一个迹象表明了后种族灭绝的社会生活状况，1959-1960年的冬天，一波反犹涂鸦和破坏犹太人墓地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这促使法兰克福的一些学校社会学家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41%表示漠不关心的学生背后，有16%的学生是公开表示反对犹太人、支持死刑(这在《基本法》中是禁止的)、表达“对权威的过度追求”的中坚力量。2

挑战这种反动和愚昧文化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克劳斯·莱纳·罗尔（Klaus Rainer Röhl）在汉堡出版的*konkret*杂志。对于那些拒绝CDU的共识和该国保守文化习俗的进步青年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论坛，杂志在SDS内部得到广泛阅读。如Karin Bauer所说，“这本杂志是从学术性、美学和大众诉求的快乐结合中蓬勃发展起来的……”3杂志无疑是政治性的，“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古巴、反殖民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反核斗争、人权和社会正义。”4

公众不知道的是，*konkret*实际上是由KPD的一个秘密小组资助并部分控制的，该小组已经流亡到东德。5杂志的主编是罗赫的妻子，她自1957年以来一直活跃于SDS，并在1959年秘密加入了非法的KPD。她叫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另一个让他们变得激进的事件是1963年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审判。22名前SS成员和1名囚监（从囚犯中挑选以协助管理囚犯的人）因谋杀或合谋谋杀而受到审判，这主要是一种宣传活动，目的是掩盖大量已经进入新西德政权的纳粹分子。不管审判的虚伪程度如何，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将近300名证人来作证，他们的证词在媒体上被报道，这一事实让我们对奥斯威辛对一代德国青年意味着什么略见一斑，他们——完全可以理解——现在会以一种恐怖的新眼光看待他们的老师、公民领袖，甚至他们的父母。

1 Ibid., 29.

2 Jean-Paul Bier, “The Holocaust and West Germany: Strategies of Oblivion 1947-1979” *New German Critique* 19, Special Issue 1: Germans and Jews Winter (1980): 13.

3 Karin Bauer, *Everybody Talks About the Weather…* *We Don’t: The Writings of Ulrike Meinhof*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8), 27.

4 Ibid., 30.

5 “My Mother, The Terrorist”, *Deutsche Welle* [online], March 14, 2006.

大屠杀的审判和普遍的“发现”对当时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是让他们变得激进的事件。6一位新左派的资深者后来回忆道：

*德国人仅仅因为有不同的信仰就可以杀死数百万人，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我的整个道德世界观都破碎了，这与对父母和学校的强烈排斥融合在一起。如果宗教没有阻止这场大规模的人类毁灭，那么它就没有任何好处，所有关于你的邻人的爱和谦和的话语…都只是一个谎言。*7

尽管回顾起来SDS似乎有一种日渐增长的反叛潜力，但在早期，SDS保持沉默，转向内部，从事着“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因为它在SPD之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努力制定出连贯一致的分析和策略。当它真正回到公众舞台时，是受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的经验影响，作为一个小的、有意识的反帝国主义组织，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的革命主体，合适的策略是采取直接行动”8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显然不是新的SDS的意识形态参考标准之一。)

1964年12月，莫伊兹·冲伯访问柏林时，这条线就被跨过了。让西德统治阶级高兴的是，在德国雇佣兵的帮助下，冲伯在刚果加丹加省领导了一场血腥的反共分裂运动。人们认为他对1961年杀害刚果首任总统帕特斯·卢蒙巴负有责任。卢蒙巴是非洲反殖民斗争深受爱戴的象征。

6 Hockenos, 34-35. See also Dagmar Herzog, “‘Pleasure, Sex, and Politics Belong Together’: Post-Holocaust Memory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West Germany,” *Critical Inquiry* 24, 2: Intimacy, (Winter 1988): 402-403.

7 Eberhard Knodler-Bunte, in Herzog, 416.

8 Hülsberg, 39.

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冲伯，当警察试图将他们赶走时，他们进行了反击，这后来被称为西德反独裁起义的起点。1

SDS在这次抗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大学校园为基础，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南半球，尤其是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日益增长和日益激烈的抗议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示威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小心翼翼的仪式；几十年来，学生抗议第一次升级为街头冲突。

1964年对*konkret*来说也是变化的一年。当时，共产主义世界因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而四分五裂。多年后，这种分裂只会变得更加严重，直到双方都认为对方客观上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一样坏，甚至更坏。尽管与KPD有联系，*konkret*还是越来越亲中国，甚至支持中国获得核武器。对此，它的东德赞助者失去了耐心，在东柏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们没能威吓迈因霍夫，让她屈服，于是他们切断了所有的资金来源。随后，迈因霍夫和罗赫从KPD辞职。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罗赫对杂志的版面做了巨大的改变，把它变成了一份光鲜亮丽的出版物——每一期都有衣着暴露的女性——它的发行量几乎增加了两倍。3

SDS、*Konkret*和其他左翼人士不但没有因脱离SPD而遭受痛苦，反而在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发展中获益，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1 Thomas, 94. See also Gretchen Dutschke, *Wir hatten ein barbarisches, schönes Leben* (Köln: K&W, 1996), 60-61.

2 Jutta Ditfurth, *Ulrike Meinhof: Die Biographie* (Berlin: Ullstein, 2007), 180-181.

3 David Kramer, “Ulrike Meinhof: An Emancipated Terrorist?” in *European Women on the Left: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Political Women, 1880 to the Present*.Jane Slaughter and Robert Kern编辑. Contributions in Women’s Studi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1), 201.

1966-1967年，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使德国的失业人数在战后第一次超过了100万，统治阶级试图利用这一局面来进一步打破权力的平衡，使之对自己有利。如Karl Heinz Roth解释的那样：

*失业的威胁和消灭所有有能力发起先进形式斗争的工人团体，这为全面的反工人攻势奠定了基础。*4

还有更多：

*老板们坦率地承认，他们正在利用这场危机来恶化（intensify）全球工人阶级各阶层的工作条件。在他们看来，这次临时的投资停摆是必要的，它可以通过“人事清理”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30万移民工人和几乎同样多的德国工人被扔到了街头。*5

为了巩固更多享有特权的德国工人的支持，从而利用无产阶级内部的分歧，SPD被纳入所谓的大联合政府，与CDU和CSU站在一起。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前反抗军战士、社民党主席维利•勃兰特与前纳粹党员基民盟的格奥尔格•基辛格一起担任副总理，基社盟的极右翼人士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担任财政部长，社民党的年轻杰出人物卡尔•席勒担任经济部长。

SPD因公开拥抱这些反动派而完全丧失了信誉，现在看来，任何真正的变革都只能在政府以外的门路发生。当年轻的工人被新的法团主义条约日益边缘化时，大学、工厂和大街上的西德年轻人的幻想破灭了。议会外反对派（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PO）诞生了。

反抗活动集中在西柏林，这是一块飞地，进入东德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西柏林官方上仍处于西方盟国的占领之下，因此尽管在法律上仍是独立的，6但仍享有作为联邦共和国事实上一部分的奇特地位。

4 Roth, 101.

5 同上, 100.

6 有一条穿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高速公路连接着柏林和联邦共和国，根据国际协议，东德有义务保持这条公路的开放。这条公路穿过荒凉的乡村，一直被东德武装部队包围着。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柏林提供了资本主义西方的个人自由，而它奇特的外交地位也为其居民提供了在西方约束之外的额外活动空间。1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搬到西柏林的年轻人可以避免服兵役，因为严格来说，他们生活在联邦德国之外。

毫不奇怪，这座城市吸引了新一代的激进分子和反叛势力。用一位住在那里的妇女的话来说，这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地区，各种政治发展比其他地方更早、更尖锐，就像在放大镜下一样。”2

因此，在西柏林，一群学生聚集在汉斯-于尔根·克拉尔(Hans-Jurgen Krahl)和东德难民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和贝恩德·拉贝尔(Bernd Rabehl)周围，开始质疑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是社会本身的本质。家庭结构、工厂和学校体制都受到了挑战，这些年轻的反叛者将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混合在一起。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多罗特娅·里德（Dorothea Ridder）和莱纳·朗汉斯（Rainer Langhans）

1 有很多例子表明联邦共和国在西柏林推行自己政策时必须要多么小心, 参见Avril Pittman, *From Ostpolitik to reunification: West German-Soviet political relations since 1974*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2-62.

2 Hilke Schlaeger and Nancy Vedder-Shults, “West German Women’s Movement,” *New German Critique* 13 (Winter 1978): 61.

公社和住房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妇女在SDS和APO内部挑战男性的领导地位和定位，建立了日托所、妇女党团会议、妇女中心和妇女专属公社。更广泛的反主流文化分子、摇滚乐手、艺术家和毒品圈子的成员联合起来参与了正在兴起的政治叛乱。抗议活动包括传统的示威游行、静坐、教学和即兴活动。所谓的“共和派俱乐部”（“Republican Clubs”）几乎遍布每一个城镇，作为讨论和组织的中心，弥合了年轻的激进分子和早期的和平运动老成员之间的分歧。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

*60年代的一代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在用德国小资产阶级伦理的对立面来反抗它，如他们所解释的那样：自由恋爱对拘谨，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公社对核心家庭，第三世界团结对排外主义，公民的不服从对服从法律，开放的尝试对传统，公然的激进主义对奴颜婢膝。*3

或者，如一位前SDS成员所回忆的那样，那是一个“一切”——杂谈、政治、性和越南——“似乎都与其他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时代。4

尽管这一新的激进青年运动在校园和潮人中越来越受欢迎，但它并未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示威活动经常遭到围观者的诘问，甚至是攻击。这种普遍的敌意为国家镇压开了绿灯，其结果很快就会一目了然。

1967年6月2日，数千人在德国歌剧院外示威，反对伊朗国王的访问，伊朗残暴的政权是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许多人戴着印有国王和他妻子肖像的纸面具；这些是第一公社（K.1 Commune5）的莱纳·朗汉斯和霍尔格·迈因斯（Holger Meins）印出来的，“所以警察认不出我们，他们只看到他们保护的人的脸。”6在这样的装点下，抗议者们用一连串的烂番茄和“杀人犯”的高呼欢迎伊朗国王和他的妻子.

3 Hockenos, 80.

4 Eckhard Siepmann in Herzog, 427.

5 K.1在德语中是“第一公社”的意思（Kommune 1）.

6 G. Conradt and H. Jahn, *Starbuck Holger Meins*, directed by G. Conradt. (Germany: Hartmut Jahn Filmproduktion, 2002).

(迈因霍夫后来在*konkret*中写道：“污损国王的学生并不是为他们自己行事，而是为波斯人的农民行事，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没有能力反抗，西红柿只是对更厉害的投掷武器的象征……”)1

6月2日的集会将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抗议者遭到了警察和伊朗特务机关SAVAK的野蛮攻击。许多人进行了反击，据报道，示威游行“演变成了战后以来抗议者和警察之间最激烈的战斗……直到凌晨12点30分左右，战斗才结束，有44名示威者被捕，同样数量的人受伤，其中包括20名警察。”2

最不幸的是，福音学生会的一名年轻成员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参加了他的第一次示威活动，就被红色分队的便衣警察卡尔-海因茨·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枪击射中后脑。奥内佐格最终被救护车接走后，又过了40分钟他才被送往医院。那天晚上他死于枪伤。



Benno Ohnesorg被警察打中后躺在地上，在同行学生Fredericke Dollinger的怀中死去

1 “Women in the SDS; or, Or Our Own Behalf, (1968)” in *German Feminist Writing*, eds. Patricia A. Herminghouse and Magda Mueller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 160.

2 Thomas, 111-112.

这起警察谋杀事件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它激发了学生运动，并将其推向了一个激进得多的方向。据估计，在奥内佐格死后的几天里，全国各地有10万至20万名学生参加了示威活动。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西柏林以外的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政治抗议。如之前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尽管枪击案发生前三分之二的学生宣称自己不关心政治，但枪击案发生后不久，一项调查发现，65%的学生因奥内佐格的死亡而变得关心政治了。”3

这起谋杀案使SDS一跃成为联邦共和国学生政治的中心。多年后，一位学生激进分子回忆：

*在全国范围内，SDS的成员还不到几百人……然后突然间涌入了许多人，我们都应付不过来。我们的办公室人满为患。我们开放了SDS，分散了权力（decentralize）。我们让来自不同城市和城镇的人们自己组织成自主项目小组，然后我们在例会上开会讨论解决问题。或多或少是偶然的，它变成了一个使人难以置信的参与式民主实验。*4

最初，政府和反动报界巨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旗下的报纸试图为这起谋杀辩护，他们重复谎言，称抗议者计划杀死警察，而库拉斯开枪是出于自卫。5施普林格的德国《图片报》(Bild Zeitung)发出了骇人的警告，称：“一名年轻人在柏林丧生，是自称示威者的政治流氓煽动的骚乱的受害者。暴动已经不够了。他们想见到血。他们挥舞着红旗，他们是认真的。这就是民主所能容忍的终点。”6

3 Ibid., 114.

4 Christian Semler in Hockenos, 69.

5 施普林格旗下的报纸主要是保守主义的通俗小报，其中包括《图片报》、《柏林日报》和《柏林摩根邮报》。他们领导了一场行动，把进步的学生污蔑为“头脑不清的人”、东德间谍和冲锋队——有时甚至越过底线，鼓吹自发组建治安警察行使暴力。如Jeremy Varon指出，“施普林格出版物占西柏林出版物的70%以上，占全国日报市场的30%以上。随着新闻界助长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学生气氛，媒体对新左派本身的反应成为抗议的主要对象。”[Jeremy Varon, *Bringing the War* *Home: The Weather Underground, the Red Army Faction, and Revolutionary* *Violence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38-39.]

6 Hockenos, 68.

6月3日，柏林参议院禁止了市内的示威活动——25岁的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是次日因违反禁令而被捕的八名抗议者之一1——警察局长杜恩兴（Duensing）自豪地解释了他面对臭香肠的策略：“左端发臭，所以我们必须从中间切开才能去掉尾部。”2至于国王，他试图安抚柏林市长海因里希·阿尔贝茨（Heinrich Albertz），告诉他不要想得太多，“伊朗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3

然而，考虑到人们普遍感到愤怒，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奥内佐格是无缘无故被杀的，杜恩兴被迫辞职，内务部参议员比施（Büsch）和市长阿尔贝茨最终也被迫辞职。

如果说6月2日可以被称为西德新左派群体学生现象的“崭露头角”，那么这一现象发生的国际环境也不无意义。奥内佐格被谋杀后仅仅三天，西德的盟友以色列就袭击了埃及，并迅速摧毁了埃及军队——以及约旦和叙利亚军队——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六日战争。

在联邦德国，六日战争为一个基础广泛的、大规模的军国主义庆祝活动提供了一个奇怪的机会。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曾经支持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同样的情绪和社会力量，突然间似乎通过支持以色列侵略者来表达自己，这些侵略者被(赞许地)称为“中东的普鲁士人”。4尽管SDS已经是亲巴勒斯坦的，但大多数左翼分子此前都对这个犹太国家怀有同情。1967年的战争明确地结束了这一局面，确立了新左派的反锡安主义方向；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它也打消了人们试图从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处理德国反犹历史严重性的努力。(更多关于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见附录3——联邦德国与以色列国，550-553页。)

1 Stefan Aust, *The Baader-Meinhof Group: The Inside Story of a Phenomenon.* Translated by Anthea Bell.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1987), 44.

2 Thomas, 115.

3 Aust, 44.

4 George Lavy, *Germany and Israel: Moral Debt and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Frank Cass, 1996), 154.

6月2日的悲剧之后，令人不安的平静笼罩着整个国家，然而这场运动仍在继续发展。激进的想法正在流行，在9月份的一次SDS会议上，鲁迪·杜契克和汉斯-于尔根·克拉尔甚至提出了左翼组建城市游击队。这是SDS或APO第一次提到这样的想法，而且就目前而言，这样的讨论仍然是一个抽象猜想。

1968年2月17日和18日，5000人参加在西柏林举行的越南问题的国际代表会议，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代表，这场运动可能达到了它的巅峰。在对在场的人讲话时，杜契克呼吁进行一场“制度内的长征”5（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在这一点上，学生领袖并不是要加入体制，而是要建立反体制，同时找出体制内可能被争取或颠覆的不满分子。) 6大会以12000多人的示威活动结束，并在多年后作为整个欧洲左派的重要突破而被铭记。7

5 Tariq Ali, *Street fighting Years: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Sixties* (New York:

Verso, 2005), 243.

6 今天提到杜契克，不能不提到“长征”，但不同的写作者对这个短语的解释大相径庭。这里给出的描述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1972年的文章“反革命下的左翼”中提出的，他在文中赞同这个概念，同时将其归功于他以前的学生杜奇克。[赫伯特·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55-57页]

7 Ali, 246.



2月21日，西柏林参议院、工会联合会和施普林格媒体呼吁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学生运动，支持美国对越南战争。8万人参加了游行，许多人举着写有“鲁迪·杜契克：头号公敌”和“柏林不能变成西贡”的标语。

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导致了一场决定性的爆发：在奥内佐格被谋杀不到一年之后，另一场针对左翼的暴力袭击成为了导火索。

1968年4月11日，年轻的右翼工人约瑟夫·巴赫曼（Josef Bachmann）向鲁迪·杜契克开了三枪，分别在头部、下巴和胸部上。杜契克被认为是SDS和APO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一直是媒体大规模反共产主义诽谤活动的目标，特别是施普林格集团，该媒体被广泛指责为此次袭击制造了舞台。诚然，巴赫曼后来在作证时说：“我每天消息来源都是《图片报》。”1

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遇刺一周后，对许多年轻的德国左翼分子来说，他们的整个国际运动似乎遭到了攻击。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反叛者，像杜契克那样是来自东部的难民，总结了他的感受如下：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制造了警察用棍棒打人和库拉斯枪击游行者；但现在特定的人们已经开始被杀掉。对于左翼的总体攻击已经制造了一种环境，这种氛围下，小的恶作剧已经不再有用了。有时不管你干了什么，他们都会把你处理掉。在我再次被送到奥斯威辛之前，我宁愿先开第一枪，这一点现在很清楚了。如果最终无论如何等待你的都是绞刑架，那么你可以提前反击。*2

巴赫曼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发动袭击的，之后要进行的每年一度的和平示威很快就演变成了反对暗杀企图的抗议活动；据估计，周末有30万人参加了游行，这是上世纪60年代西德规模最大的游行。3全国各地的大学都被占领，与警察的连续战斗持续了四天。“施普林格也开枪杀人！” 成为激进分子的共同口号，在许多城市，该公司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数千人被捕，数百人受伤入院，两个人(一名记者和一名抗议者)被杀，很可能是被警察打死。5月1日，5万人在西柏林游行。



“革命不会因铅中毒而死”

空前数量的工人阶级青年参加了这些战斗，而被警方逮捕的人中大学生只占少数，这一发展令统治阶级担忧。4

一切都结束时，至少有20个城市发生了暴力冲突。价值25万马克(约8万美元)的财产被损坏或摧毁，包括价值超过10万马克的窗户玻璃。5

这次叛乱和警察的镇压把许多激进分子的思想推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例如，博米·鲍曼(Bommi Baumann)认为，骚乱让他看清了武装斗争的可能性：

*在斗争的现场，我真的明白了群众斗争-恐怖主义（mass struggle-terrorism）的概念；这个我想了这么久的问题，我终于明白了。革命运动的机会在于：当一个坚定的团体与群众同时站在一起，以恐怖的方式支持群众的时候。*6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她把自己的想法发表了出来，并在*konkre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抗议到抵抗》的开创性文章与公众分享了这些想法。她认为，在复活节暴动中，“抗议和抵抗之间的界限被越过了”，她承诺“准军事的警察部署将以准军事的方式予以回应。”7

1 Thomas, 170.

2 Bommi Baumann, *Terror or Love? The Personal Account of a West German*

*Urban Guerilla* (London: John Calder Publications, 1979), 41.

3 Thomas, 171.

4 Ibid., 176.

5 Ibid.

6 Baumann, 41.

7 Thomas, 180.

5月31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Notstandsgesetze），该法案除了为政府提供处理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危机的工具外，还旨在为这场运动提供更大的干预。CDU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这样一项压制性的立法，让反对它的声音短路是与SPD组成“大联盟”的优势之一。由于4月的暴力事件刚发生不久，这项法案就轻松通过了。（就在莱茵河对岸，法国似乎也处在革命的边缘，享受着60年代标志性的反叛，这一点当然没有影响事情发展。）

在新法案中，《基本法》得到了修改，允许国家窃听电话和查看邮件，不再受之前要求通知目标个人的规定的阻碍。特别提出了对涉嫌准备或实施“政治犯罪”的人进行电话监视的规定，尤其是对受《刑法》第129条所管辖的那些人，将“成立或支持犯罪协会”定为犯罪。《紧急状态法》还正式批准使用秘密摄影、“追踪者”和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告密者和密探。

整个5月，在该法案通过成为法律的过程中，大学被占领，学生罢课，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人举行示威抗议，与此同时，同样数量的工人举行了一天的罢工。对批评者而言，该法案代表了在联邦共和国重建法西斯主义道路上迈出的危险一步，而大联合政府不顾广泛的反对声浪，通过该法案，更是加剧了这种担忧。



一场抗议《紧急状态法》集会的海报：“《紧急状态法》计划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在做闭幕演讲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罗尔夫·波尔的人，他当时是慕尼黑APO中一位著名的法学生。

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活动在法兰克福尤为引人注目，法兰克福是西德的金融中心，也是学生运动的知识理论（intellectual）中心。5月27日，学生们占领了法兰克福大学，并举行了几天的研讨会和讲习班，讨论各种政治问题。5月30日，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突击搜查，以清理校园。

尽管如此，该法案还是成为了法律。

反对《紧急状态法》运动的失败被新左翼视为一次惨痛的失败。许多人杞人忧天，担心这些法律会被用来建立一个独裁政权，就像兴登堡在1930年和1933年使用类似的权力建立一个独立于议会的政府一样，而这促成了纳粹的独裁。用汉斯-于尔根·克拉尔的话来说：

*德国的民主已经结束。通过协调一致的政治激进主义，我们必须形成广泛的、激进的抵抗这些事态发展的基础，这些事态发展很可能导致战争和集中营。我们今天反对专制国家的斗争可以防止明天的法西斯主义。*1

1968年，在这种令人激动陶醉的气氛下，事态持续升级，部分运动逐渐演变成更有组织、更有野心的抗议活动。这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可能是在政府撤销豪斯特·马勒律师资格的同时发生的行动。

马勒是西柏林左派的超级明星，被称为“嬉皮士律师”，在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案件中为激进分子辩护。他曾参与SDS，是西柏林共和派俱乐部和社会主义律师集体的联合创始人。他在当年4月的反施普林格抗议活动中被捕，国家启动了程序，要求撤销他的律师资格，这一举动在之后看来是愚蠢的。

1 Thomas, 180.

2 Hockenos, 88.

3 Aust, 65-6.

4 Ibid., 64.

马勒的案子对西柏林左派而言成了一个新的抓典型人物的案例，他们觉得政府企图让他们最忠实的法律辩护人闭嘴。柏林自由大学和技术大学的学生会在听证会当天呼吁抗议，一名组织者称其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示威破坏司法系统。”1

11月3日爆发的巷战被称为“Tegeler Weg之战”2而载入史书。一边是戴头盔的抗议者（大约1500人）用鹅卵石和二四英寸见方的长木条（two-by-fours）进行攻击，在另一边，警察（1000人）用高压水枪、催泪瓦斯和警棍：

*几名律师和旁观者被年轻人从人行道上扯出来扔出去的鹅卵石砸伤，其中大多数年轻人戴着安全帽，在拿着扩音器的领导人的指挥下，他们一波又一波的前进。*

*穿着简易护士制服的女孩把受伤的示威者被抬到等候着的救护车上，车上标有蓝色的十字架。*3

警察也没有幸免。另一家报纸报道说：

*示威者以游击战的方式造成大量警察伤亡，他们向警察猛推，撤退，巩固，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发起猛冲。*

*他们一度击退了150码（约137米）外的300名警察…据警方统计，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有120人受伤。其中10人不得不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发言人说，21名受伤的示威者中有7人被送往医院。逮捕人数为46人。*4

1 Associated Press, “Student ‘Army’ Battles With Berlin Police,” *Fresno Bee*,

November 4, 1968.

2 Tegeler Weg是西柏林一条时尚的街道，这里是律师协会的所在地。

3 Associated Press, “Student ‘Army’.”

4 George Thomson, “Berlin police, leftists battle,” *Lowell Sun*, November 4, 1968.

5 Ibid.

当晚，几个燃烧瓶被扔进警察局的马厩，一匹马受伤。后来有人指出，这次攻击是一个名叫彼得·乌尔巴赫的奸细所为。6

法院拒绝取消马勒的律师资格。几天之内，这位好斗的律师又一次因为他最新的案子而成为头条新闻：为年轻的反法西斯分子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Beate Klarsfeld）辩护，后者掴了CDU主席兼前纳粹分子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一巴掌。7马勒最终为克拉斯菲尔德赢得了缓刑，随后他代表克拉斯菲尔德反诉了基辛格，声称总理是前纳粹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对他的委托人的侮辱。8

Tegeler Weg之战是另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参与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的意愿，这类活动已经几十年来没出现过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第一次秘密武装活动的实验，我们将在稍后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越来越多的镇压活动的阴影困扰着左翼激进分子，但他们仍有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愿望和能力。

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的发展也提供了诱人的前景，即通过让步和在体制内工作，改变可能会以更舒适的方式发生。

1969年10月，大联合政府结束，在“让我们勇于更加民主！”的口号下，SPD政府(与FDP联合)当选。社民党领导人维利·勃兰特担任现任总理，自民党领导人沃尔特·谢尔担任外交部长。统这一基本上具有象征意义的职位由政坛老将古斯塔夫•海涅曼)担任，他被普遍认为是联邦共和国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尽管他曾担任大联合政府的社民党司法部长。9

基督教民主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失去了对西德议会的控制。

6 Aust, 145.

7 Associated Press, “Woman gets Jail for Slapping Bonn Chief,” *Fresno Bee*, November 8, 1968.

8 Associated Press, “Hit Kiesinger; Term Suspended,”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August 26, 1969.

9 事实上，海涅曼早在1949年就为基民盟担任了一个内阁职位，在50年代早期，为了抗议阿登纳的重整军备政策，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也离开了CDU。1961年，迈因霍夫因为一篇konkret的文章被基社盟领导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起诉诽谤，海涅曼同意处理她的案子，成功地为她辩护——在20世纪50年代的和平运动中，两人就算不是朋友，也是盟友。

新的社民党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部分满足了学生们更为“合理”的要求：对东德采取新的外交姿态，更容易成为因良心而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性同意年龄和法定投票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通过无过错离婚法，以及一系列旨在现代化和开放沉闷、等级森严的德国学校体系的改革。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崭新的一天。

与此同时，勃兰特宣布了一项“立即现代化和加强犯罪预防的计划”，其中包括：

*加强刑事调查局的工作，使其设备现代化并扩大其权力，重新装备和改组联邦边防卫队，使其成为联邦警察部队，并在安全部门内设立一个“监视外国人问题研究小组”。*1

不过，这些措施不会影响到大多数激进分子，而政府从CDU时代错误的保守主义中走了出来，这迷惑和引走了不太忠诚的学生，抽走了激进左翼的潜在支持来源。与此同时，运动本身也开始分裂。

受美国、法国和英国女权主义运动鼓舞的激进女性越来越难以忍受APO中男性至上的问题。1968年9月2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SDS会议上，事情达到了高潮。汉斯-于尔根·克拉尔在会上拒绝解决SDS的男性沙文主义问题，结果被人用西红柿招呼。尽管许多(但不是全部)来自APO的女性将继续被认为是左派，但她们的政治轨迹变得越来越分化，这既是由于妇女运动内部的动力，也是由于运动外部持续存在的性别歧视。

APO的出现，还伴随着试图建立符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各种工人党的新尝试。1968年，被取缔的KPD重新建立，更名为DKP，但自诩有同样的纲领和领导方式。然而，大多数年轻的激进派对于这个“新的”共产党并不感兴趣，不仅因为它与毫无吸引力的东德政权有联系，还因为在阿登纳禁止它之前的那些年里，人们认为其表现平庸而胆小。

1 Cobler, 154-155.

相反，在它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主义党，绝大多数都充满敌意地反对苏联和美国。这些组织中还有数量少得多的托派组织，所有这些组织最终被称为“K团体”，其发展大致类似于与此同时在北美发展起来的新共产主义运动。

那些继续保持着比SPD更左倾向而没有加入任何这些新的以政党为主的组织的人，包括从APO的反独裁阵营、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独立社会主义者中成长起来的自发(sponti)左翼。他们一起被称为“非教条左派”，他们的堡垒是法兰克福，慕尼黑，当然还有西柏林。

运动继续挣扎，但越来越困难，往各个方向分裂，因为APO似乎在接缝处分裂了。

1970年3月，在法兰克福学生会大楼举行了一场混乱的大会之后，在鼓掌表决中，SDS解散了。个月后，政府采取了一个聪明的策略，对那些被判短期监禁的抗议者颁布了大赦令，从而赢得了这些中产阶级学生中的许多人重返体制。西德的学生运动特别容易受到这种休整的影响，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更舒适的阶级里有一席之地；例如，1967年，只有7%的西德学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相比之下，在英国这个数字几乎是三分之一）。1

尽管APO无力应对面前的挑战，但人们无法否认，它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变了西德社会：

*后果包括教育改革；新的东方政策；*2*家庭、学校、工厂和公共服务中的家长专制关系解构；发展国家计划经济；妇女更多地参与职业生活和性别立法改革……APO也推动了社会文化与过去的决裂。基于责任观念的旧禁欲主义行为结束了。*

*随着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观念出现了一套新的性观念，以及对国家和所有形式权威的旧的尊重和顺从态度的瓦解。换句话说，那里发展了一种新文化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铺平了道路。*3

1 Thomas, 144.

2 东方政策：联邦德国对东德和东方集团的官方政策

3 Hülsberg, 42-43.





来自APO的不同倾向采用不同的美学风格

上图：激进杂志《Agit 883》的呼吁，号召人们反对越南战争

下图：“大家都来参加5月1日的红色集会；抵制工资控制；抵制工资奴隶制度；一个反对SPD政府背叛行为的工人阶级联合阵线”



# 拿起枪杆子

随着APO的垮台，大多数比SPD还要左的人仍然致力于合法的、地上活动的激进主义。然而，该运动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用另一种实践来试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

武装斗争的第一个实验源于反主流文化群体，当时西柏林第一公社周围的人开始实施燃烧弹袭击和银行抢劫。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自一个毒品和无政府主义自由交织的环境，他们在一个被称为“蓝调”（the Blues）的环境中游荡，并取了一个故意带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散兵游勇反叛者的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oaming Hash Rebels）。博米·鲍曼后来开玩笑地解释说：

*毛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流寇思想”。从所谓的强盗团伙中，他和朱德建立了红军的第一支干部队伍。我们的鼓动是为了让那些仍然部分缺乏政治意识的嗑药者意识到他们的处境。我们做的是群众工作。*4

散兵游勇反叛者在许多不同的名称下进行过行动, 但最出名的是以乌拉圭城市游击队命名的“西柏林-图帕马洛斯”。1最初，这种反独裁的、前游击队的派别遭受反智主义、毫无疑问的大男子主义和缺乏连贯的策略的折磨。它还因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掩护下容忍和从事反犹主义而受到批评，其最初的行动之一是在纳粹大屠杀周年纪念日向犹太教堂的文化活动中心投掷燃烧弹。2

另一方面，它似乎的确和它的根基人群之间有一种有机的不好的联系。（本句原文：“it did seem to enjoy an organic relationship with its base, such as that was.”，可能指该组织继承了一些不良的流氓无产作风——译注）

随着APO的解体和散兵游勇反叛者的许多领导成员被捕，或者他们只是改变主意了，这一派别的残余部分最终形成了一个名为“六月二日运动”的游击组织（2JM——the 2nd of June Movement，指1967年本诺·奥内佐格被枪杀的那一天）。植根于西柏林的这个小团体，最终克服了许多最初的弱点，同时保留了一种平易近人、经常幽默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在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的和自发（Sponti）事件的现场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第二个游击派别，也就是我们更直接关注的游击队派别，把那些在散兵游勇反叛者的反文化环境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倾向更严肃。博米·鲍曼后来解释说，他们“几乎和我们同时形成，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完全疯了。”3这第二种派别在理论上更加严格(对其批评者来说，是更自命不凡)，不仅受到马克思、列宁和毛的很大影响，而且还受到新左派哲学家的影响，从尼科斯·普兰查斯到法兰克福学派。

1968年4月3日，也就是鲁迪·杜契克被枪杀的前一周，新兴的德国马列主义游击队界在法兰克福两家百货商店进行了燃烧弹袭击，这是他们最早的公开表现。带有简陋计时装置的汽油弹被留在了Kaufhaus Schneider和Kaufhof的建筑中，在午夜前爆炸起火。大火造成了近70万马克(22.4万美元)的损失，但无人受伤。

1 Ibid., 59.

2. Tilman Fichter, Philipp Gessler和Stefan Reinecke采访，“68一代的反犹主义”，*die tageszeitung*，2005年10月25日。这一行动是为了表示声援巴勒斯坦的斗争。见Baumann的书，60-61和67-68。

3 Baumann, 76.



这幅漫画出自激进的反主流文化杂志《Agit 883》，画中有一个年轻男子从一辆车里扔出了一个燃烧弹，他长得非常像杂志编辑团队的成员霍尔格·迈因斯。他因为忘记换车牌而被逮捕，但幸运的是，他的一些朋友愿意为他担保，警察被迫释放了他，尽管他们知道是他做的。

4月5日，霍斯特·祖恩莱恩[Horst Söhnlein，有的文献译为旬赖/松尔敏(我不知道这个姓按德语怎么能念成这样？)——译注]、托尔瓦德·普罗尔（Thorwald Proll）、古德伦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从西柏林赶来参加SDS会议，并以纵火罪被逮捕。

这四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保护他们的身份和避免被捕。他没有发表任何公报，回想起来，这一行动在执行过程中显得很轻率。他们中有的刚开始否认他们参与其中，后来试图将其罪责最小化，巴德尔称，“我们无意危及人类生命，甚至没有纵火的意图。”1

在法庭上，四人没有统一的策略；起初，巴德尔和恩斯林显然没有怨恨或指责别人，他们最初试图为自己辩护，但后来转变为承任全部责任，同时坚称托尔瓦德和祖恩莱恩因都是完全无辜的。2就他们而言，这两个人并没有否认他们的参与，但也没有选择为自己辩护，尽管普罗尔确实对法院和司法系统进行了雄辩的谴责(见后文)。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种政治行动，尽管定义不明确。在法庭上，恩斯林解释说，纵火是为了“抗议人们对杀害越南人漠不关心”，并补充说，“我们发现，没有行动，语言是没有用的。”3

然后，她对一名电视记者说，“我们已经足够明确地说，我们做了错误的事情。但我们没有理由和这个国家与法律来讨论它。我们必须和和我们想法一致的人讨论这个问题。”4

这四人被SDS断绝关系，但他们被其他人欢迎，对他们来说，这一违法行为似乎既恰当又及时。他们就像激进左翼的小传媒明星，” 托瓦尔德的妹妹阿斯特丽德·普罗尔(Astrid Proll)多年后回忆道。5

迈因霍夫就是其中一位崇拜者。1967年，她与konkret的发行者克劳斯·莱纳·罗尔离婚，带着他们的双胞胎女儿搬到了西柏林。她拜访了狱中的古德伦·恩斯林，并在她的杂志专栏上赞许地写了这件事。她认为：“在百货商店纵火的进步之处不在于破坏商品，而在于该行为的犯罪性质，即违反法律……”6

1 Aust, 51, 58.

2 Ibid., 58.

3 Ibid., 58.

4 Ibid., 62.

5 Astrid Proll, *Baader Meinhof: Pictures on the Run 67-77* (Zurich: Scalo, 1998), 8.

6 Aust, 60.

在公开场合，纵火犯们在第一公社的朋友们表达了他们的声援，在公开场合，纵火犯的第一公社的朋友们宣布了他们的团结，弗里茨·托伊费尔（Fritz Teufel）解释了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话：“烧百货公司总比经营百货公司好。”7然而，私下里，他们对整件事的执行过程多么的笨拙感到奇怪，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四个人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一种潜意识里想进局子的欲望。8

1968年10月，四人各自被判了三年监禁。

当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一个熟悉的人站了起来：“这次审判属于学生法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9喊道。这时，旁听席上爆发出一片混乱，两名被告试图逃跑，警卫身边挤满了围观的人。由于这场混战，包括科恩-本迪特在内的三人被逮捕，四名纵火犯仍被拘留。10

第二天，一些不知名的人向法兰克福法院投掷了三枚燃烧弹。11同样，没有人受伤。

纵火犯的辩护律师是豪斯特·马勒，在他这次失败的辩护之后的几天内举行的听证会上，政府没能取消他的律师资格，而那场听证会导致了前文提到的Tegeler Weg之战。这四人将不能参加导致西柏林警察历史性溃败的事件（指Tegeler Weg之战——译注）：尽管他们对判决提出上诉，但他们一直被监禁到1969年6月。那时法院最终作出了判决，他们才能够在自己缴纳保证金的情况下被释放。

7 Andreas Elter “Die RAF und die Medien: Ein Fallbeispiel für terroristische Kommunikatio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online], August 20, 2007.著名共产主义剧作家布莱希特曾说过，“小人物（small-timers）抢劫银行，专业人士拥有银行。”

8 Aust, 51-2.

9 “红色丹尼尔”是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法学学生，1968年因在当年的五月事件中扮演了象征性的领导角色而被禁止进入法国(正是他的被驱逐事件导致学生们占领了楠泰尔大学)。如今，他是德国绿党中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1969年，他以无政府主义学生暴动的典型形象而闻名于世。正如我们将在第11节中看到的，(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某个别的位置……) ，他将在70年代中期的反激进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10 Associated Press, “Cohn-Bendit Jailed; Court Brawl Follows,”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November 1, 1968.

11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New Violence Hits Frankfurt,” November 2, 1968.

69年的夏天到了秋天，法庭继续进行审议，刚被释放的恩斯林、巴德尔和普罗尔将忙于“学徒集体”的工作。这些集体由逃离国家单位（state homes）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当时是正在四分五裂的APO的政治运动对象。阿斯特丽德·普罗尔回忆道：

*当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恩斯林获释时，他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与迷糊的“公社社员”不同，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清晰和决心……古德伦和安德烈亚斯在法兰克福发起了一场反对少年犯机构内专制管理制度的大型运动（campaign）。我们和那些从封闭的机构中逃出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作为一名忠实、批判性的记者，加入了我们，并与古德伦和安德烈亚斯成为了朋友。*1

1969年11月，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命令四人返回监狱：只有祖恩莱恩屈服了。恩斯林和巴德尔转入地下，开始建立长期武装斗争所必需的联系。托尔瓦德·普罗尔快就被抛弃了——人们认为他不够认真——但他的妹妹阿斯特丽德加入了他们。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逃犯们将越境进入法国和意大利，再次回到西柏林，为未来的组织打下基础。此时，他们又恢复了与律师豪斯特·马勒的联系2，他仍面临着因1968年4月叛乱而产生的刑事指控。3在经历这些法律斗争的同时，豪斯特本人也一直试图在柏林建立一个 “激进团体”，4因此，与他以前的委托人联合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战略决定。

1 Proll, 8.

2 Aust, 73.

3 Associated Press, “West Berlin Publisher is Sentenced,” Danville Bee, February 16, 1970.

4 Aust, 77.

与此同时，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考虑并拒绝了与安那其游击小组联合的想法，这些游击小组在散兵游勇反叛者的圈子内彼此联合。这一决定继续沿着不同的道路走下去的原因并不明确，其后果可能比预期的更为微妙。重要的是要记住，许多参与其中的人物都是在APO认识的，在某些情况下是朋友，当然也会对彼此的政治和个性有意见。据说，散兵游勇组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迪特尔·孔策尔曼（Dieter Kunzelmann）对巴德尔要求领导权持谨慎态度。也有人说，红军派整体上态度傲慢，由中产阶级学生组成，与所谓更无产阶级的六二运动格格不入。6

虽然游击队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但人们不禁想知道，红军派成员可能会对散兵游勇组织的反文化场景有什么看法，特别是对性别的安排。第一公社不仅因其杰出的宣鼓、激进的文化实验和惊人的毒品消费而闻名，还因其在APO时代席卷联邦共和国的性别革命中所扮演的标志性角色而闻名。与此同时，第一公社的性别政治构成了对德国基督教压迫性保守主义的一种反应，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环境，围绕着关键人物的欲望而建立。一夫多妻制几乎是强制性的，妇女在“革命者”之间轮换——正如一个男性公社所说，“这就像训练一匹马；一个人要把她训练好，然后她就可以为所有人所用。”7博米·鲍曼后来在谈到这些散兵游勇叛军时承认，“他们纯粹就是女性的压迫者；没有别的说法了。”8

5 Ibid.

6 Baumann, 77-78.

7 Herzog, 425.

8 Baumann, 75.

9 Eileen MacDonald, Shoot the Women First (London: Arrow Books Ltd., 1991), 209-210.

然而，这些不同的解释不仅难以评价，而且有可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安那其游击队圈子与马列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将在整个70年代持续下去，前者的许多成员最终加入了红军派，而少数个人则继续与这两个组织开展行动。当然，从可以看到的情况来看，这两个组织之间始终存在着高度的协调和团结。虽然他们的支持者可能偶尔会发生不愉快的争执，但实际的战斗人员即使走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似乎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最终，在80年代初，六二运动公开宣布集体加入红军派。这就为一些反对合并的六二运动的政治犯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对自己为什么一直选择分开战斗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虽然这些意见是在十多年后提出的，但它们有助于阐明这些早期的关系：

*当时红军派与六二运动之间的矛盾，是各团体发展方式不同的结果：六二 运动来自其成员的社会舞台，而红军派则是在其革命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同样，这也是红军派集中的组织模式和我们的自主、分散结构两种模式的结果。另一个有冲突的问题是在干部转入地下的问题上，红军派坚持把转入地下视为原则问题。*

*因此，六二运动的直接先行者总是对实际的--无产阶级的--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这种替代方案与竞争无关，而更多的是与革命斗争的不同设想有关。*

*在这两个团体的早期，有强有力的相互支持和共同的行动......当时这两个团体都以这样的想法进行，即未来将决定哪一种政治设想将被证明是长期有效的。*1

1 Ralf Reinders, Klaus Viehmann, and Ronald Fritzsch, “Zu der angeblichen Auflösung der Bewegung 2. Juni im Juni 1980,” http://www.bewegung.in/mate\_nichtaufloesung.html. 这是一份长得多的文件的节选，该文件与2JM的合并宣言一起，将出现在我们的第二卷，《红军派，一部纪实史，第二卷：与帝国主义共舞》-“进一步，退两步”中

因此，在这一萌芽时期，尽管要在斗争中选择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各种积极分子之间的分歧已经澄清，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友好接触。为了得到庇护和支持，那些在地下活动的人开始依赖那些合法存在的朋友和盟友的善意和忠诚。迈因霍夫是偶尔庇护巴德尔和恩斯琳的人之一，她已经感觉到他们的奉献和目标感，与她自己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媒体明星日益空洞的存在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她的左翼政治“臭名昭著”。与此同时，迈因霍夫继续与关在管教机构的年轻人，特别是少年管教学校（reform school）的女孩一起工作，她开始与她们一起制作一部电视纪录片。

虽然迈因霍夫最终因她接下来的人生所做的事情而闻名于世，但值得强调的是，她作为记者的时间远非无足轻重。正如她的传记作者尤塔·迪特富特（Jutta Ditfurth）所言：

*迈因霍夫的专栏，尤其是有关产业工人和管教学校的孩子的电台专题报道，对许多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远远超过她所意识到的。她提出的主题，多年后才被人们所关注。例如，妇女问题。当SDS中的女性从大男子主义的男人那里为自己辩护时，她们使用了迈因霍夫文章中的语句。她能简明扼要地表述事情。*2

1970年4月3日，巴德尔在西柏林被警方线人设局抓获。3彼得·乌尔巴赫（Peter Urbach）多年来一直活跃在第一公社周围，同时一直在秘密代表国家行事。他与第一公社特别“亲密”，至少从1967年起就认识巴德尔。虽然乌尔巴赫提供给年轻叛乱分子的炸弹和枪支似乎从来没有起过作用，但他提供的硬性毒品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表明，即使人们在明面上过度吹捧麻醉剂的“解放”作用，政府也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4

2 Jutta Ditfurth, interview by Arno Luik, “Sie war die große Schwester der 68er,”

Stern 46 (2007).

3 Aust, 81.

4 Ibid., 47.

虽然人们总是强调，在不同的战斗人员中，既没有等级之分，也没有偏爱之情，但巴德尔似乎带着一种大胆和可能的感觉，这使他总是在相同的人中居于首位，无论好坏。因此，在他被俘后，组织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把他从国家手里救出来。

一个计划被酝酿了出来，迈因霍夫将利用她的记者证申请许可，与巴德尔合作写一本关于青年中心的书，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这个领域都有一些经验。监狱当局不情愿地同意了。5月14日，巴德尔在警卫的护送下在西柏林郊区的社会问题研究所图书馆与她会面。

这提供了必要的机会。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一进图书馆，两位年轻女性就走进了图书馆：一位是迈因霍夫从少年管教学校招募来的十几岁女孩伊蕾妮·戈尔根斯（Irene Goergens），另一位是来自西柏林的激进医生英格丽德·舒伯特（Ingrid Schubert）。他们后面跟着武装蒙面的恩斯林和一名带武器的男子。当一位上了年纪的图书管理员，格奥尔格·林克(Georg Linke)试图干预时，他的肝脏被打中。1警卫们拔出武器开火，没有击中任何人，所有六个人都从图书馆的窗户跳了出去，跳进了停在楼下街道上的逃跑车里。2

逮捕后不到一个月，巴德尔就重获自由了。

图书馆越狱事件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迈因霍夫和恩斯林都被确定为可能的参与者。记者们试图在耸人听闻的垃圾新闻里超越对方，把一个说成是中产阶级装逼犯，另一个说成是前色情女演员。3当一个新法西斯主义军火商金特·福格特（Günther Voigt）被逮捕并被指控向游击队出售枪支时，4头条新闻被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来。然后，法国记者米谢勒·蕾（Michele Ray）声称她在西柏林会见了马勒、迈因霍夫、恩斯林和巴德尔——她立即将她大量采访录音内容卖给了《明镜》周刊。5

1 根据多方说法，林克是在现场被该男子意外击中的。显然，他有两种武器，一把气枪和一把真枪，他想用前者来吓唬他，但搞不清哪把是哪把。(MacDonald, 213.)

2 Aust, 6-9.

3 Neil Ascherson, “Leftists Disturbed by Violence of Berlin Gunmen,” Winnipeg Free Press, July 4, 1970.

4 Ibid., Becker, 125.

5 Aust, 15-16.

这个小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正如在越狱期间驾驶逃亡车辆的阿斯特丽德·普罗尔后来所解释的那样，6这是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我想我们都很紧张，我记得有些人吐了。因为我们不是那么优秀的罪犯，我们不是那么优秀的枪支，我们让一个所谓的罪犯参与进来，他比我们做得更好，而且... ...他太紧张了，以至于他向某人开枪。他没有杀了他，但他开枪把他打得很惨，这对整个事件的开始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糟糕。*7

她在别处详细说道：

*在一个人严重受伤后...我们发现自己成了通缉犯。这是一场意外，加速了小组地下生涯的发展。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这个组织的边缘，突然在每一块广告牌上都被通缉，罪名是谋杀未遂，悬赏1万马克......当我们在地下时，没有更多的讨论，只有行动。*8

国家利用媒体对越狱事件的狂热，帮助推动新的镇压性立法——在这次事件中就是所谓的《手榴弹法令》，根据该法，西柏林警察配备了手榴弹、半自动左轮手枪和冲锋枪。9

6 Ben Lewis and Richard Klein, Baader Meinhof: In Love With Terror (United Kingdom: a Mentorn production for BBC FOUR, 2002).

7 Ibid.

8 Proll, 10.

9 Ascherson, “Leftists Disturbed.”

这一切在左派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促使这些逃亡者们给激进的883报社发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们解释了这次行动和他们未来的计划(比较防御性的)。在激进的前电影系学生霍尔格·迈因斯的坚持下，该报发表了这封声明，这成为了游击队的第一份公开文件。霍尔格当时在883报社工作，后来成为了红军派的领导人物。（即使没有迈因斯的支持，883不发表此文也是很奇怪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马勒和恩斯林都曾在编辑部工作过，同样还有其他几个后来加入了游击队的人。）1

红军派从此诞生了。

第二年，他们学习了一些技术技能，包括去了约旦，在那里，十多名有抱负的德国游击队员接受了巴解组织的训练。虽然这第一次访问对该组织可能没有太大意义，但考虑到后来该组织与某些巴勒斯坦组织的重要联系，研究一下旅行发生的背景可能是有益的。

当时，约旦有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以来，难民人数激增；到1970年，巴勒斯坦人约占该国2,299,000总人口的100万。

巴解组织以难民营为基地，设法在约旦境内建立了一个实际上平行的国家。事实上，许多人认为，约旦的革命可能是打败以色列的一步，"通往特拉维夫的道路要经过安曼 "的口号表达了这种想法——至少可以说，这种情绪让侯赛因国王感到担忧——约旦领土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各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后方基地区也是如此。2

1970年9月，左翼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劫持了三架西方客机，将它们降落在道森机场，这个机场在约旦偏远的沙漠地带。这为侯赛因提供了他需要的借口，而巴解组织很快就遭到了由以色列支持的国王军队的攻击。到停火协议达成时，有4000到1万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亚瑟尔·阿拉法特称有多达2万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包括许多非战斗人员。(这将被称为 "黑色九月"，巴解组织的非官方游击队也正是为了纪念这次大屠杀而采用了这个名字)。

在此之前，巴勒斯坦人的约旦基地不仅在阿拉伯世界，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都是革命者的重要灵感和教育来源。虽然来自土耳其的访客最多3——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留下来与巴勒斯坦人并肩战斗——但也有来自法国、丹麦、瑞典的，当然还有西德的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游击队。(据称，散兵游勇反叛者的成员早已接受了巴勒斯坦人的训练，Baumann指出，这是它转变为地下游击队的一个转折点)。4

1 Datenbank des deutschsprachigen Anarchismus: Periodika, “Agit 883,” http://projekte.free.de/dada/dada-p/P0000921.HTM.

2 Helen Chapin Metz,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Israel, a Country Study (Whitefish, Montana: Keesinger publishing 2004), 110.

3 Cengiz Candar, “A Turk in the Palestini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0, no. 1. (Autumn, 2000): 68-82.

4 Baumann, 59页，“当人们从巴勒斯坦回来的时候组织出现了分裂。巴勒斯坦派说：‘他们现在走的路没有意义。我们必须真的从武装斗争开始。’这意味着放弃‘蓝调’（见前文——译注），这整个开放的圈子。”

即使在中东期间，红军派仍不断成为德国的头条新闻。豪斯特向一家激进报纸发送了一张自己挥舞着枪、打扮得像一个游击队员的照片，并写道：“来自一千零一夜的土地，向你们的读者致以最美好的祝福！”5

撇开少年的戏剧性/幼稚性（Juvenile theatrics）不谈，这次旅行标志着红军派的一个方面非常公开的开始，这个特点将困扰着警察，即他们熟练地利用外国作为后方基地地区。正如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的那样：

*后方基地区很少有人讨论，但对游击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一种明确的东西：这是与主战场接壤的大片区域或地域，对方不能自由活动。或是因为偏远或难以逾越的山脉，或是因为它跨越了政治边界。*6

红军派将广泛利用各种阿拉伯国家作为后方基地，在他们的整个存在期间，这些地方不仅可以用来训练，还可以在欧洲变得太“热”时藏身。至少在上世纪70年代，似乎并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为该组织提供了援助和救助，而是深深扎根于整个地区难民人口之中的各种巴勒斯坦革命组织。因此，在1970年巴勒斯坦人败于约旦武装部队之手后的几年里，黎巴嫩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成为不止一个西德革命者的故土外的家乡。

5 Ascherson, “Leftists Disturbed.”

6 Butch Lee, Jailbreak Out Of History: The Re-Biography of Harriet Tubman

(Montreal: Kersplebedeb Publishing, 2000), 25.

当然，另一个外国支持的来源是“共产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红军派和其他游击组织多年来从那里得到各种形式的援助。就红军派而言，这种关系究竟是如何或何时开始的，目前还不清楚。当然，如果它在70年代初期就存在的话，那也是非常秘密的，事实上在激进的左派中也是无法想象的，对他们来说，“另一个”德国政权仍然是一个腐朽的专制政权，时而是“斯大林主义”，时而是“修正主义”，但无论如何，这个政权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然而众所周知，早在1970年，东德确实选择了明知故犯地允许游击队通过其领土，比如在往返中东的航班上。在第一次前往约旦后，它甚至拘留了一名成员——汉斯-于尔根·拜克（Hans-Jürgen Bäcker），并对他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的关于地下活动的询问，但随后将他释放。1显然，到60年代末，这一政策已扩展到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还有人称，甚至在1970年训练出行时，如果迈因霍夫的双胞胎女儿的父亲从她姐姐那里赢得了监护权，就计划将她们迁往东德。2

在东德不受人们欢迎的情况下，为什么红军派会接受这种援助，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很容易猜到：一开始，东德的 "援助 "似乎范围很有限，其实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3谁能抱怨呢？

最终，我们会看到，更多实质性的好处即将到来：庇护、训练，甚至是新的身份——然而，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对没有迹象表明红军派选择其目标或制定其意识形态来取悦外国赞助人。这在组织接近消亡的时候会变得更有待商榷，但当然，在1970年代，红军派与史塔西的联系即使不是短暂的，也似乎是偶然的。最多，人们可能会认为民主德国煽动游击战是为了对付美国人，因为越南的战火仍在继续。

1 Aust, 99-100. 拜克会声称，根据他们的问题，很明显，东德人已经对该组织的活动有了充分了解。1972年11月，博米在东德边境同样被拘留，当时他持有假身份证；他也接受了类似的询问，并在获释前提供了近100名西德地下组织成员的信息。Jan-Hendrik Schulz “Zur Geschichte der Rotee Armee Fraktion (red army faction) und ihrer Kontexte: Eine Chronik,” Zeitgeschichte Online, May 2007.

2 Ditfurth, 290. See Appendix V—Strange Stories: Peter Homann and Stefan Aust, pages 557-558.

3 Deutsche Presse-Agentur, “Stasi soll red army faction über Razzien informiert haben,” September 29, 2007.

当然，整个20世纪70年代，与巴勒斯坦的联系更为重要，但游击队员对中东的第一次访问却以不乐观的结局告终：根据几份报告，这些西德人远非理想的客人，而巴勒斯坦人最终把他们送走了。

在1970年夏末，他们途径东德返回西柏林。4

小组现在开始寻找汽车和安全屋。他们建立了新的联系，招募了新的成员，其中包括伊尔莎·斯塔霍维亚克（Ilse Stachowiak）、阿里·扬森（Ali Jansen）、乌利·朔尔策（Uli Scholze）、贝亚特·施图尔姆（Beate Sturm）、霍尔格·迈因斯（Holger Meins）和杨-卡尔·拉斯佩（Jan-Carl Raspe），后者是迈因霍夫的老朋友，他本人也是第二公社（Kommune 2）的创始成员。5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不久就改变自己的决定，一有机会就退出了，有些人则会决定红军派的走向，甚至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首先，这个年轻的游击队员需要获得资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与散兵游勇叛乱者圈子一起计划了一次大胆的联合抢劫银行行动。69月29日，在十分钟之内，三家不同的西柏林银行遭到袭击：这些革命者没有开一枪，也没有遭受一次逮捕，就成功地获得了超过22万德国马克(刚刚超过6万美元)。7正如豪斯特·马勒的前法律助理莫妮卡·贝尔贝里希(Monika Berberich)后来解释的那样，“这不是为了重新分配财富，而是为了赚钱，我们也不打算在街上抢劫老太太。”8

“三重壮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看起来不错。

4 Aust, 99, 101.

5第二公社是西柏林的另一个公社，相比雅皮士式的第一公社，它享有更“严肃”和更“理性”的声誉。

6 Reinders, Viehmann, and Fritzsch. 7 Aust, 108.

8 Baader Meinhof: In Love With Terror.

然后，10月8日，警方收到了一条匿名举报，说西柏林有两个安全屋。马勒和贝尔贝里希，以及英格丽德·舒伯特，伊蕾妮·戈尔根斯，和布丽吉特·阿斯东克，都被逮捕了。(有人怀疑汉斯-于尔根·拜克向警方告密。他遭到了质问并予以否认，但很快与游击队分道扬镳。后来有人声称红军派处决了有嫌疑的叛徒或那些想离开红军的人，在评价这一说法时，应该考虑到他并没有受到骚扰这一事实。) 1

在这些逮捕之后，红军派转而将行动转移到西柏林之外，该组织的成员开始越境抵达西德本土。在这一时期，这个初露头角的游击队抢劫了两个小镇的市政厅，拿走了空白的身份证、护照和官方印章，以备以后行动之用。

12月20日，卡尔-海因茨·鲁兰（Karl-Heinz Ruhland）和红军派成员阿里·扬森和贝亚特·施图尔姆在奥伯豪森被警察拦下。鲁兰只是外围人员，他投降了，而扬森和施图尔姆则逃走了。第二天，扬森与红军派成员乌利·朔尔策在试图偷窃一辆奔驰车时被捕。(施图尔姆很快就离开了游击队，朔尔策在被抓一天后被释放时也是如此。鲁兰与警方合作，帮助透露安全屋的位置，并在法庭上作证指控红军派成员。扬森因向警察开枪而被判刑10年。)

1971年2月10日，法兰克福警察发现了阿斯特丽德及其红军派战友曼弗雷德·格拉斯霍夫（Manfred Grashof）。警察开枪射击，显然是想在两人逃跑时将其击毙，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打中。随后，参与其中的警察声称他们开枪是出于自卫，但他们不知道整个现场被宪法保卫局（Verfassungsschutz）的人观察到，他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这两名游击队员甚至都没有拔出武器。这一事实一直被国家封锁多年。2

与Proll和Grashof的所谓“交火”被警方编入了越来越多的宣传故事中，来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搜查提供理由。联邦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 公开宣布红军派为“头号公敌”。盖尔森基兴、法兰克福、汉堡和不来梅的公寓都遭到了突袭，但这游击队设法逃脱了抓捕。

与此同时，豪斯特·马勒、英格丽德·舒伯特和伊蕾妮·戈尔根斯的审判于3月1日在西柏林开幕。舒伯特和戈尔根斯被控谋杀未遂和在巴德尔越狱事件中使用武力，而马勒（他在行动期间安排在法庭上出席，因此有不在场证明）被控为同谋和非法持有枪支。

1 Aust, 111-112.

2 Ibid., 140.

对红军派的这第一次审判将为二十年来媒体、警察和秘密人士之间的勾结定下基调，他们意图以最可怕的方式来表现游击队。“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一词最终被左派用来形容这一现象。

早在2月份，警方就已经宣布红军派有计划要绑架勃兰特总理，以迫使政府释放马勒。3游击队随后否认了这一指控，声称这是为了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政治白痴”。

然后，2月25日，一个七岁的男孩被绑架了。报纸宣称绑架他的人要求近5万美元的赎金，以及释放 “柏林的左翼律师”，记者很快解释说这一定是指马勒。5马勒显然吓坏了，他公开呼吁绑架者释放孩子。6与此同时，北威州政府同意支付赎金——这个男孩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他们付不起这么多钱。7

政府与劫匪双方达成了协议，一位著名的律师同意充当中间人。钱在2月27日星期六送到，年轻的米夏埃尔·卢默（Michael Luhmer）被释放在慕尼黑郊外的树林里，他患了流感，但其他方面没有受伤。据亲自把钱交给绑匪的律师说，绑匪否认对马勒或其他红军派的人有一丁点兴趣。事实上，他留下的印象是，绑匪们实际上是“一个像纳粹党一样的右翼组织”。8警方后来宣布，他们怀疑一名前党卫军军官的儿子参与了这一阴谋。9

3 Associated Press, “Paper reports plot to kidnap Willy Brandt,”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February 13, 1971.

4 See page 84.

5 Associated Press, “Terrorists Take Child as Hostage,” Troy Record, February 25, 1971.

6 Associated Press,“Wrong Boy Kidnaped, Released; Ransom Paid,” Panama City News Herald, February 27, 1971.

7 Ibid.

8 Associated Press, “Kidnaped German Boy, 7, Freed After Ransom,”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February 29, 1971.

9 Associated Press, “Police Hunting SS Member’s Son in Kidnapings,”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March 2, 1971.

第一次绑架发生时，马勒、舒伯特和戈尔根斯正准备出庭受审。这就是所谓的“假旗”行动，这个词指的是某些群体打着他们所敌对的另一个集团的旗号进行的攻击，以便诋毁他们。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整个1970年代，打着假旗的攻击一直困扰着红军派，因为假扮成游击队的人将进行或威胁进行各种反社会犯罪。

红军派一遍遍否认参与这些行动，然而诽谤却不绝于耳。

令人倍感困扰的是，在大多数这些假旗行动中，从来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到底是谁干的。怀疑的范围包括为国家工作或为北约工作的一些特务机构，或者可能是新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是这两者的结合。又或者这些都是“正常”的犯罪行为，是媒体或警察编造细节，把它们与红军派联系起来。

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完全有可能是国家内部、北约内部以及极右翼内部的人在这些袭击中进行了合作。例如，这样的情况已知在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都有过发生。这些行动的目的一般不只是要败坏左翼游击队的名声，而是要营造一种普遍的恐惧气氛，让人们团结起来支持极右势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次红军派审判过程中，发生了第二次假旗绑架，而这第二次犯罪的作者最终竟承认了这一诡计。

4月25日星期天，报纸报道说，一位大学教授和他的朋友被RAF游击队绑架了，游击队威胁说，如果不释放马勒、舒伯特和戈尔根斯，就要处决他们。据称绑架者要求允许这三人前往他们选择的国家之一，并坚持要在电视上宣布这全部过程。1

1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Professor Endangered by Kidnapper’s Threat,”

Dominion Post, April 25, 1971.

两天后，两名男子被发现，其中一人被绑在一棵树上。然而，绑架者却不见踪影。经过一番询问后，“俘虏”们崩溃了，并承认他们策划了整件事，希望以此吓唬人们在石荷州的州级选举中投票反对“左翼的”社民党。2这个计划的策划者于尔根·里格尔（Jürgen Rieger）在新法西斯圈子里很活跃；3结果，他最终因此被判6个月监禁。

作为这些预谋行动的必然结果，警方很乐意为审判本身布置场景：

*莫阿比特监狱的刑事法庭已变成本次审判的堡垒。配备冲锋枪的警察在走廊和进出口巡逻;大楼外面停着发动机运转的车辆，载着一队队的士兵，军官们带着无线电设备，还有更多的部队等在里面的院子里，如果有必要，他们将投入行动。*4

极右翼的骗局为警察惊人的军事化和镇压提供了理由。即使不是一个多疑的阴谋论者，也会认为政府为了摆脱新的武装对手，非常愿意玩弄肮脏的把戏，“逐渐法西斯化”的说法也不仅仅是花言巧语。

这并不是说激进的左派不愿意为被俘的战斗人员而战，虽然绑架无辜的儿童或学者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策略之一。当最终实施绑架时，目标都是体制内的重要成员，这些人与游击队所反对的体制有个人联系。

然而，在1971年，没有人能够进行这样的行动，因此，争取囚犯自由的斗争主要在街头进行。随着审判的结束，西柏林爆发了两天的暴动。“年轻人封锁了交通，砸碎了商店和车窗”，同时高喊着“释放马勒！”和“别碰马勒！”等口号。5

2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West German Professor Admits Kidnaping Hoax,”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April 27, 1971.

3 于尔根·里格尔律师的职业生涯一直在致力于捍卫这些被德国反纳粹法指控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06年，里格尔和马勒最终都成了新纳粹出版商恩斯特·聪德尔(Ernst Zundel)的法律辩护团队的一员，他被指控与出版否认屠杀的文献有关（马勒此时自己也是大屠杀的否认者）。

4 Aust, 144.

5 Associated Press, “Berlin Cops, Leftists Clash for 2nd Night,”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May 17, 1971.

很明显，虽然它的能力还没有发展，一部分左派愿意开展激进行动来支持游击队，而自己更愿意留在地面上。

5月下旬，经过22天的法庭审理，判决书下来了。戈尔根斯被判4年青少年监禁，舒伯特则被判6年监禁。1

应当指出的是，这两名妇女不久将有额外的判刑年数，因为她们还面临与各种银行抢劫案有关的指控。2

至于马勒，他被判无罪，但因州政府对判决提出上诉而被拘留。他还面临着与银行抢劫案有关的其他指控。3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国家还逮捕了其他战斗人员。

1971年4月12日，伊尔莎在法兰克福被一名警察认出并逮捕。斯塔霍维亚克的外号是“Tinny”，她可能是游击队中最年轻的成员，1970年16岁时加入。

第二天，罗尔夫·海斯勒（Rolf Heissler）在慕尼黑试图抢劫一家银行时被捕。海斯勒此前一直活跃在慕尼黑图帕马洛组织（一个受西柏林图帕马洛组织启发的巴伐利亚小组）中，4但他跟随前妻布里吉特·莫恩豪普特（Brigitte Mohnhaupt）加入了红军派。

5月6日，就在阿斯特丽德在法兰克福死里逃生不到三个月后，她在汉堡被加油站服务员认出并报了警——她试图开车逃跑，但被武装警察包围并被逮捕。5

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份文件，据说都是由红军派制作的。第一本是《关于西欧武装斗争》（Regarding the Armed Struggle in West Europe），由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的激进的西柏林出版社以《新交通规则》的无害标题出版。6这不仅导致瓦根巴赫根据第129条7——万能的奥威尔式的1951年安全法中“支持犯罪组织”的条款——被判缓刑9个月，而且这份文件很快就被红军派自己否定了：它是马勒在监狱里写的，没有与任何其他人协商，而且集团的其他成员也不同意。

1 Jillian Becker, *Hitler’s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 Baader Meinhof Gang* (London: Panther Granada Publishing, 1978), 307.

2 戈尔根斯1977年被释放后，她没有回到游击队。舒伯特将如我们所见，没能或者出来。

3 Becker, 307

4 Baumann, 63.

5 Macdonald, 214-215.

6 Aust, 142.

7 Cobler, 113.

尽管马勒将暂时留在红军派中，但这是这位前律师和游击队其他成员之间正在疏远的第一个明显迹象。

几乎在马勒的文件开始流传的同时，第二份文本，一份享有整个红军派认可的文本被发布。5月1日，在一年一度的“五一”节示威活动中，支持者分发了被称为红军派的基础宣言，上面印有一颗红星和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城市游击概念》。这篇文章被广泛转载，不仅是在883这样的激进出版物上，也在主流的《明镜周刊》上，这是自由派周刊（the liberal weekly）同意向青年收容所“捐赠”2万马克的交易结果。8

《城市游击队概念》大量借鉴了游击队员在APO的经验，以及他们所看到的新左派的弱点，试图回答人们关于红军派的一些问题，同时批评无政府主义圈子和K组织（被尊敬的称为“无产阶级组织”）。这也构成了在地下与游击队联合的一种公开邀请。

这是一份针对经验丰富的左派活动家的文件，讨论了他们在法律斗争中的挫折感，希望能把他们争取到秘密行动中来。

8 *tageszeitung* “30 Jahre Deutscher Herbst ‘Die red army faction war nicht ganz so schlicht,’” *Deutschlandradio*, October 17, 2007.

面对这样的司法体系，我们不愿费心为自己辩护

*这是托尔瓦德·普罗尔在法兰克福百货公司燃烧弹袭击案审判中的结案陈词。(M.& S.)*

对合谋纵火罪的审判紧随纵火罪的审判之后。但这显然是另一个问题。正义是统治阶级的正义。面对一个以统治阶级的名义说话的司法系统——而且说话并不诚实——我们不愿费劲为自己辩护。面对用1870/71年关于破坏治安和引发骚乱的法律迫使一对学生夫妇躲藏起来，判处他们12个月监禁而不得假释的司法系统，我们实在懒得为自己辩护（破坏治安的人，烧掉他们摇摇欲坠的安定）。

面对一个使用1870/71年的法律，然后谈论什么是公正的——并且说话不诚实的司法系统——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面对一个因跳过安全栅栏而给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1（*lex Benda, lex Bendit*，这两个短语不知道什么意思，相关德语材料也只有一句der lex Benda die lex Bendit——译注）判处8个月缓刑的司法系统，我们无法费心为自己辩护。面对这样一个司法系统，它在另一方面，只是为了减轻自己右翼的负罪感而执行对大多数纳粹的审判，审判中，他们指控任何对元首誓词宣誓的人都是罪犯，2但整个司法系统自己倒是很愿意在1933年进行这种宣誓；面对这样的司法系统，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

1 那年夏天早些时候，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因为在一次抗议德国书商和平奖向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颁发“和平奖”的活动中穿过保安设施而被判处八个月缓刑。

2 所有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都必须向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宣誓效忠的一段誓词。数百万人宣誓的原因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面对一个只起诉杀害犹太人的次要凶手，而让杀害犹太人的主要凶手逍遥法外的司法体系，我们不能不为自己辩护。面对一个在1933年无耻地陷入法西斯主义，在1945年又同样厚脸皮地抛弃法西斯主义的司法体系，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早在魏玛共和国，司法体系就对左翼分子[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3, 恩斯特·托勒尔( Ernst Toller)4]的判决比右翼分子（阿道夫·希特勒5）的判决更重，而这个司法系统则对杀害卢森堡和李扑克内西6的凶手（并因此成为杀死他们的同谋）进行了奖赏，因此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同志们，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扑克内西——起立！——法律的眼睛就坐在这个法庭中。

3 恩斯特·尼基施，恩斯特·托勒尔短暂参与过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后来成为德国沙文主义组织“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不清楚为什么普罗尔把他单独挑出来作为魏玛政权迫害左派的例子，尽管在纳粹统治下，他将在1937年以 “文学上的叛国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4 恩斯特-托勒是巴伐利亚犹太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他因在1919年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中的身份而入狱。(随后他被流放，最终于1939年在纽约的酒店房间里自杀。)

5 1924年4月1日，希特勒因1923年11月8日企图发动法西斯政变，即所谓的啤酒馆暴动，被判处5年徒刑。1924年12月，他被赦免并获释，服刑不到一年。

6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是1918年失败的德国共产主义起义的领导人物。他们都被右翼民兵“自由军团”逮捕、拷打、杀害。

我们的司法系统从未废除过它的专制结构，还不断地更新它，我们也懒得为自己辩护。面对一个强权即公理，强权高于公理（强权总是正确的）的司法体系，我们不会去为自己辩护。一切权力归于自由！面对一个保护资产和财产比维护人类更好的司法系统，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面对一个作为社会秩序工具的司法体系，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

面对一个反对人民而不是为了人民而制定法律的司法系统，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人权只属于右翼人群(倒向右翼的国家)。右倾(right)是国家所做的，它总是正确的(right)。国家是唯一允许的犯罪活动。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中，在这样的间接民主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最终统治任何人，这就是它会存在的方式，也不管这会持续多久。统治地位的道德是资产阶级道德，而资产阶级道德是不道德的，并且将一直如此。如果进行改革，也只会导致一种新的不道德形式 (而且仅此而已)。面对一个破坏人们道德基础(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的司法系统，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这个州检察官不过是犯下罪行的司法系统的一分子。他也需要被判处6年徒刑。

此外，面对一个自称代表人民，但实际上代表统治阶级的司法体系，我们不屑为自己辩护。对一个确保现有关系得以持续再生产的司法系统，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面对一个将（所谓的）犯罪阶级钦点为有罪的而且将继续这么认为的司法系统，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回归社会意味着什么？回到哪个社会？回到那个你将有机会再次犯罪的资本主义社会？回到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监狱，相当于从一个窟窿掉进另一个窟窿。

每一次刑法改革都是对现有刑事不公的改革；刑法就是刑事不公；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是他们又给我找了个理由，我也不会再次在社会上犯罪。被改变了的我怎么能回到一个未改变的社会（How am I supposed to return changed to an unchanged society），诸如此类等。需要改变的不是法律，必须改变的是社会！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面对一个尊崇抽象法律概念（罗马法就是波西米亚法），不把个人看成社会产物的司法制度，我们无心为自己辩护。面对一个将被告视为二等公民的司法体系，我们不为自己辩护。

此外，面对一个作为统治阶级制度的司法体系，我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此外)面对一个没有减少犯罪，而是制造更多犯罪(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的司法系统，我们无意为自己辩护(事情的结果只能符合他们的利益)。在这样的威权民主制度下，它永远不能超越对有罪或无罪的评估。法官判决的是个人，不是社会，也不是他自己。那个神奇的字眼是什么？这个词是权力，它意味着是自由之死！我们这里有什么东西不是来自尼采那个反社会的人？例如，权力意志。你应该惦记权力，但不要认为权力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自己的力量；因此：要摧毁权力[权力的问题，问题的权力（the question of power, the power of the question）]。面对一个想要权力而不是自由的司法系统，我们无意为自己辩护（你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奴役，社会主义的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面对一个试图将第一公社定罪并通过无休止的审判迫害他们的司法系统，我们不能为自己辩护。这样的司法系统本身就应该受到审判。面对一个要把一部分SDS成员定罪的司法系统，我们无法为自己辩护。1870/71年的公共治安怎么能在1967/68年被打破呢！再一次的：烧掉这虚伪的治安稳定！

此外，面对一个具有法律观念的司法系统——一个欺骗性的概念——这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见所塑造的[1882年弗朗茨·冯·李斯特（Franz von Liszt）1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不会选择为自己辩护。此外，面对一个不把犯罪视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司法系统，而它通过的判决没有社会功能（弗朗茨·冯·李斯特），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面对一个讲究惩罚——这意味着压迫，意味着镇压——帮助着犯罪者的司法制度，然而实际上维护着资产阶级社会，一直在维护它，将它保卫到底；面对这样的司法制度，我们不会自己辩护。

引用刑法改革初稿中的话：“刑罚严酷之必要性”，“责任在于违法者”（而不是法律代表），“鉴于人的本性是有缺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指人性缺陷——译注）将一直存在，在这个社会里，不存在促进改善的反专制体系，也不会有道德改善的例子——有罪原则，保证了惩罚原则的延续，而它的存在意味着自由的死亡，保证了权力的完整性）。再引用刑法改革初稿中的一句话（这将是最后一句）：“惩罚原则所预设的是一个几乎不受质疑的刑法标准，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何时才能停止？

1弗朗茨·冯·李斯特（不要与他的表弟、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混淆）是一位普鲁士法学教授，他的工作对1882年的《马堡纲领》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纲领是一份保守的文件，影响了1933年纳粹德国的《预防犯罪法案》。

面对一个认为不合理的刑法标准和犯罪学标准是恰当的，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现实，以一种特别令人作呕的方式否定和压制心理学和犯罪学，并不断阻碍它们发展，把犯罪学当作为一门社会关系的科学的司法体系；面对这样的司法体系，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此外，面对一个代表统治阶级法律的司法系统——代表着两面派作风——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

另外，资产阶级的道德是而且仍将是不道德的，如果改革了，也只是作为一种新的不道德。一切改革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制度所固有的。我们要求司法部长海涅曼辞职（这也是无意义的要求）。那个不理会这些废话，加入总罢工而不是永远陷在这些淹没他的垃圾里的法官在哪里？反对专制的法官在哪里？我看不到他们。这是你的机会，佐贝1（Zoebe）先生，来成为第一个。这是我认识你之前写的。后来，你们对民主这个词的反应就像它是麻风病，也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概念避让不及。对你来说，重新社会化让你愤怒；这是最后一击。对你来说，这是最后一击。永远地：最后一击。

面对一个拥有完全专制法官的司法系统，比如法官施瓦伯2（Schwalbe），我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一个施瓦布并不能代表一个夏天中所遇到的法官全是专制主义者）。面对有着这些法官的一个司法系统，像汉堡的一个法官在今年8月15日，经过2分半钟的听证会后，就判处一个年轻工人4个月监禁，监禁从复活节开始，但有可能假释，法官说这个年轻工人应该高兴——尽管听证会很简短——但是他得到了澄清自己政治动机的机会，然后继续告诉这名年轻工人，他应该停止担心与他无关的事情；面对由这样的法官组成的司法体系，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再一次：要烧毁这摇摇欲坠的和平。

在这样一个司法体系中，有像蒂莫·林内特审判3(Timo Rinnelt trial)中那样的法官，再一次扩大了警棍在德国的使用范围，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

1 格哈德·佐贝（Gerhard Zoebe）是这个案件的法官。

2 法兰克福的一位法官，经常主持对左翼被告的审判。

3 1964年，威斯巴登的7岁男孩蒂莫·林内特被绑架和谋杀。几年后，他的邻居，一个二十七岁的男子因此罪被捕。1968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最后，面对这样的司法体系，有像主审尤尔根·巴奇4（Jürgen Bartsch）的法官，把犯人判处无期徒刑，理由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本可以努力控制自己反常的欲望(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法官最后说，“愿上帝帮助你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是上帝，而不是社会——对这样的法官来说，他最好是很久以前从未出生或早早就死了；面对这样的司法体系，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

人们说，对尤尔根·巴奇的审判是世纪审判。这实际上是对本世纪的一次审判，而判决书是为本世纪进行辩护的，也就是说，它为上一个世纪的道德规范进行辩护（它只会越来越糟），在这次审判中，上一个世纪的道德被当作野蛮的胜利来庆祝。当宣读判决书时，聚集在一起的观众(一群小资产阶级)鼓掌欢呼。没有人禁止这样做。正义的牙齿在颤动，但没有人听到。杀害儿童的人是有用的。他们消除了罪犯曾经自己也是孩子的意识（专制教育）。每年有一百个西德家庭的孩子被打死。被打死。杀害儿童的凶手努力让我们对这种杀戮的罪恶感有所缓解。而越南每天都有儿童被谋杀呢？（其死亡数量骇人至极）体面人们又在祈祷什么？今天，我们每天都能拿到像定额口粮配给的凶杀案(施普林格的报纸是每天这种早餐的核心)。

此外，资产阶级道德是统治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是不道德的。面对司法系统，有格里贝尔5这样的州检察官，他在“四个眼睛之下”6告诉我，他最尊重马克思的教义(但他对此做了什么呢？)，说他和我一样，是迷宫般官僚机构的囚徒。(但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指责这里的左派只想改变表面的东西，但除此外什么都不想改变但他的额头上刻着犯下压迫的该隐的记号[（the mark of Cain of repression on his forehead）]，他还有脸向我袒露他那破碎的资产阶级的心，说一方面他对统治条件的僵化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多么荒唐——他继续谈论1870/71年法律的合法性——虚伪的谈论着——面对此等司法机构，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们也无意为自己辩护。要把州检察官关起来。能起诉国家的州检察官在哪里？

4 尤尔根·巴奇，德国连环杀手，小时候遭受过情感和性虐待，在60年代犯下了四起残忍的儿童谋杀案。

5 瓦尔特·格里贝尔（Walter Griebel）是本案的检察官。

6 德语中的 "unter vier Augen"；这显然是指纳粹对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一个亲信参加的会议的称呼。这些讨论的内容本应在两人之间进行。

面对一个指控我们犯有危及生命的纵火罪的司法系统，我们都懒得为自己辩护了。面对这样一个司法系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他们眼里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政治上的污点，我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所有被指控的人都是纵火犯，所有法官都是诚实的人)。再一次地：烧掉这虚伪破烂的和平。

再者，面对一个为统治阶级说话的司法系统——而且说话是欺骗性的——我们无法为自己辩护。

面对这样的司法系统，有像卡佩尔（Kappel）法官那样专制的羁押法官，他给人的每一个印象都是在审判开始前就确信所有被告人有罪（不管那是什么）。除了其他的事情外，他的大男子侵略习性是这样的，他对我说，“把你的手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 当我把另一只手放进口袋时（显然不是同一只手），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起来，我的笑声卡在了喉咙里，因为想到我和他竟然会因为同一件事——意识问题——而发笑。面对这样的司法制度，我不能为自己辩护，我们也不能为自己辩护。

面对如此腐朽的司法体系，我们都懒得为自己辩护(只有在法律上正确的才是合法的权利)。面对一个荒唐地滥用拘留的司法系统，我不会为自己辩护。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司法系统会一直扣留你直到你失去它，也就是说，直到你被丢出去。然后司法系统说，“啊，你并没有啊。任何情况下，如果你被释放，你将不会再有一个固定住所。而这基本上会确定你有逃跑的风险。”面对一个荒唐地滥用预防性拘留的司法系统，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这样他们揭示了司法系统的深坑。果你有固定的地址，警察会确保你失去它，这样他们就可以拘留你。奥古斯特·克莱（August Klee）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和我一样已经被拘留了几个月。虽然所有这些还不足以使我相信生活是一出戏剧性的戏剧，但我相信看守所可以做到。当以这种方式拘留克莱时，警察向他保证，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这让刑事警察成为潜在的罪犯。

嫌疑人逃跑的风险总是提供给警察必要的借口。例如，奥古斯特·克莱也被归为有逃跑风险，因为他最近的亲人，首先是他的妻子，都住在德国之外。如果他想出逃，他就必须和她离婚（这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如果你住在德国，而没有和妻子住在一起（那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没有家庭关系（因为你没有被家庭束缚），那么你就有逃跑风险的嫌疑。如果你在40年前在国外住过，就是一个逃亡的风险。如果你最近刚从旅行中回来（不是从一些糟糕的旅行中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一个逃跑风险。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那么你就是一个逃跑风险。（这些我都能背下来了）。如果在逮捕你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差错，就像最近发生在哈默斯加斯（Hammelsgasse）案(资产阶级给的自由就是哈默斯加斯案1)中那样，没有必要担心，会准备好一些对你伪造的文件。这里的危险在于你可能会被灭口(be silenced)。

定罪后，你可能会因为表现好而被释放。然而，他却被拒绝了，因为他表现得太好了，已经被束缚在制度文化内了，所以肯定在外面找不到方向。他必须在里面呆到死。这就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重新改造有风险的例子。如果你碰巧是一个纵火犯，就会有有利证据被故意隐瞒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司法体系，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

面对一个支持着这样的监狱系统的司法体系，这个系统每一秒都在攻击和侵犯365个人的人身自由和尊严——首先是攻击，然后是侵犯——我们无法为自己辩护。

在羁押候审中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被羁押的囚犯被允许做司法系统——作为管理者——允许他们做的事情。不允许你感到害怕。你不被允许躺在床上，但你可以躺在床底下。你不被允许用多个球打乒乓球；你只被允许玩一个球。你不能拒绝吃饭；不允许你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挑衅。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你永远不能展露出违抗。

1 Hammelsgasse是法兰克福上流社会街区的一条街道，可按字面意思翻译为羊肉巷；意在用文字游戏的方式指代羊群被引向屠宰场。

\

指定1.23马克1为每天的膳食摄入标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啊）。你不能把你的晚餐扔到看守的脸上，否则他就不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负责。看守和你一样都是囚犯，他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看守只是小军阀。

你不能在牢房外吸烟，只能在牢房内。你被允许在你的牢房里经历这地狱般的一切。你不被允许点火，因为你不能用火灾报警器，而这是因为你够不着它，够不着它又是因为你不能离开牢房，因为牢房的门是锁着的。

不允许你借机和其他囚犯，也就是所谓的罪犯进行讨论，无论这可能产生什么结果。让我们明确一点，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主要产物。你得弄清楚这一点。

此外，你不被允许在墙上挂任何东西，但你可以把写着“你不被允许在墙上挂任何东西”的便条挂起来。你不被允许傻站着。你被不允许靠墙站着。你不被允许到处晃悠。你应该用每天的时间对司法系统有更彻底的了解。

如果你去见牧师，别忘了那只是一根拐棍。不要去教堂，上帝已经死了，但切还活着。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你就会拥有你需要的一切。

只允许你每天散步半小时。不允许你向窗外大喊大叫。不允许你有多少同志。你被允许每周消费35马克2。这就是黑森州的情况。别忘了，黑森的刑罚制度最宽松。不允许你想喝多少咖啡就喝多少。你不能喝任何酒精饮料。不允许你抽大麻。不允许你用你想的方式消费，不允许你想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而这一切却都在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社会里。注意，在监狱里，消费变成了一种享受。

通信受监控。性交是不被监控的，但这种行为也不会有很多。私通是不允许的（这是怎么回事?），但完婚也是不允许的（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那些在狗洞里还坚持资产阶级要存在下去的人（那些认为别无选择的人要有难了），也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会被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逼得发疯。事情就是这样。例如，他们该如何维持他们的婚姻？他们都会失败，这很好。

1约40美分

2约11.2美元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到监狱去真正了解情况。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去监狱，以获得对形势的真正理解。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坐坐牢，这样才能与社会主义建立正确关系。

然而，每个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都有机会成为第一个炸掉监狱的人。不要读施普林格的报纸；烧掉它们。然后把施普林格炸飞。

如果你想打人或者手淫，你是不被允许的。你可以对你的身体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同性恋的两重性存在着。如果新的性法律通过了，你还会被允许跟小妞上床吗？更不用说其他囚犯了。在布茨巴赫监狱，胸罩生意兴隆。强迫鸡奸（这是怎么回事?）。强奸折磨你的狱警。

你不被允许实施非法闯入，但你可以越狱。我是说越狱。越狱未遂不属于可起诉的罪行。你不能索取第一公社的*Klau Mich*3一书中的1-3张照片，因为其中的淫秽内容对羁押中心的道德秩序构成威胁。

地方法院的法官Glojne(又名Globne）在一封信中向我解释了这件事——这是谁问的？——不允许你在你的牢房上挂任何东西，也不允许在牢房里吊上自己。不允许你藏在你的牢房里。试试吧，不允许你从图书馆拿任何东西，不允许你失去理智，你可以购买食物和特产，以及其他你需要的符合合理生活方式的物品，不允许你违反这些条件。但是管理员决定什么是合理的手段（这个精神病院的每个管理人员）。

3 《偷走我》

因为秩序的原因，他们想要减少你收到的报纸和杂志的数量，你必须尝试用扰乱秩序的手段——在反专制秩序的意义上的手段——把它们送到你手里。你必须从警卫手里把它们扯出来，就像他从你手里把它们扯过来一样。你得试试，你不能不尝试就放弃。如果监狱长用“恁”1（Du，德语第二人称）称呼你，你也必须用“恁”回敬他。你绝不能工作一天产出80芬尼2（pfennig）。你不能让自己被剥削利用。司法系统进行着最秘密、最有效和最可耻的剥削。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它通过使用原始的资本主义技术来养肥自己。抱怨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不允许你提出普通的牢骚，这会被随意镇压的。共同处置就是共同的处置，单独的处置就是单独的处置。你不能向孤独屈服。你不能失去对话。你不能失去社会主义对话。在监狱里，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所有的一切都在等你赢得。

注意，这里提到的还押犯的权利和责任是对不平等和奴役的介绍；你是一等公民，你是二等公民，你是四等公民，你是五等公民等等，你就是罪犯，你们就会一直这样。关于陪护人员的行为：罪犯必须立即脱离陪护人员；他必须立即脱离。

1 德语中有两种第二人称的单数形式；“du”用于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年轻人和非常亲密的朋友，“Sie”则是礼貌的称呼。作者的意思是，傲慢的行为应该用傲慢的行为来回答。

2 约30美分

刑罚机构的生活是工作时间、自由时间和静默时间被仔细划分的生活，犯人必须遵守这种划分。惩戒机构的生活就是兵营里的生活。它由无所事事组成。刑罚机构的生活分为压迫时间、奴役时间和死寂时间。意识没有觉悟的日子要结束了。现实主义的时间已经开始。资本主义中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还押。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现在你该知道了。不允许你活着，也不允许去死；不允许你死，也不允许你活。就是这样。不允许你在屋里乱跑。不允许你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指定的地方。不允许你越狱。不允许你对着窗户大喊大叫或喊话。不允许你和你的狱友说话（这是怎么回事？）。不允许你威胁机构的安全。不允许你拒绝交出、储存或使用任何东西。不允许你保留任何东西等等。

你必须要做一切不允许你做的事，你也不能放松警惕。时刻要想着。把每一个州检察官都送进监狱。你不被允许为自己辩护。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的人就是在自证其罪。一定要忘掉去做这些辩护。不允许你有未经授权的电话联系。你的通信会被监控。你从监狱寄出的信是不能密封的。不允许你自己封上它们。你不被允许……你不被允许……

你不能屈服于疲劳。你不能冒着被报复的危险，在街上经过居德3（Güde）议员时不把他推来推去。他激发了你最好的一面。但在此之前，你必须把你的手染成红色。很明显，说的是左手。

但是，你不能再一次（在狗洞子里）屈服于疲劳。集中精力，你坐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集中营里。除此之外，犯人还要保持牢房的清洁。监狱里最有压迫力的是清洁的力量。打扫卫生是主要的折磨方式。在打扫东西的时候，不允许你弄脏东西。只有在适合你的时候才可以打扫。否则你不是在监狱里，监狱是在你心里。要记住：牢房越干净，地狱越完美。另外，犯人和他的七个手提箱4以及他的牢房随时都可以被搜查。被搜身的时候，你要问他们是不是要找新人，等等等等。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面对这样一个有着难以形容的监狱系统的司法体系，我们不会为自己辩护。这种司法体制本身必须受到起诉。这样的司法体制必须在革命过程中被揭露出来。对这种司法体系采取法律行动，是每一个反威权制的法官的责任。我们鼓励司法系统中的反对专制的部分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总罢工。我们特别鼓励反对专制的毕业实习生发动总罢工。

3 马克斯·居德（Max Güde），前纳粹，当时是基民盟议员。

4 指苏联诗人萨穆伊尔·马尔沙克（Samuel Marschak）的一首诗，写的是一个女人带着她的贵重物品去火车站的故事，这首诗的德语标题是*Die Sieben Sachen*（意思是“七个手提箱”）。

我宣布声援古德伦·恩斯林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尽管他们选择在这里为自己辩护，这显然是一个没有人真正理解的决定。这种声援将持续到他们在监狱和教养院的下一个阶段。无论如何，我都有理由这样做。我宣布与霍斯特·祖恩莱恩站在一起。尽管他选择不为自己辩护，但如果我这样做了，这既是普罗利塔团结（*prollidarisch*）1，也有利于团结。我的话就此为止。

我们宣布，我们声援SDS为回应有人最近企图破坏其公众支持而采取的所有行动。我们要求废除司法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保证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统治。

我们要求废除某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的权力。

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

我们必胜！（*Venceremos！*）

托尔瓦德·普罗尔

1968年十月2

1 将作者Thorwald Proll的姓和*solidarisch*，德文中的“团结的”一词结合起来的新词。

2 罗纳尔德·奥古斯汀网站上的这段文字的日期是1968年3月，但我们认为这是个错误，因为相关的纵火事件是在1968年4月才发生的。

组建红军！

883报社的同志们，

向错误的人解释正确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们不想向那些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向那些被吓坏了的人，向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解释释放巴德尔的行动，而是向人民中潜在的革命阶层解释。也就是说，向那些能立即理解这一行动的人解释，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囚犯。那些不想与“左派”的胡言乱语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这些仍旧没有任何意义和结果。那些受够了的人！

必须向Märkisch社区的年轻人，向Eichenhof、Ollenhauer和Heiligensee的女孩，向集体宿舍、青年中心、Grünen Haus和Kieferngrund1的年轻人解释释放Baader的行动。

向多子女家庭，对年轻工人和学徒，对高中生，对住在贫民区的家庭，对西门子和德律风根、SEL和欧司朗的工人，对已婚妇女，她们既要做家务，又要养育孩子，还必须做计件工作——该死的。

他们才是必须理解这种行为的人；那些因必须遭受剥削而得不到补偿的人。不在他们的生活水平上，不在他们的消费上，不在他们的房贷上，甚至不在他们的有限信贷上，不在中型汽车上。那些连这些小玩意都不能奢望的人，不会被这一切所诱惑。

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老师、教授、地主、社工、督导、领班、工会代表、市议员向他们承诺的未来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谎言，但他们仍然害怕警察。只有他们——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明白那一切现在都结束了，明白这是一个开始，解救巴德尔只是一个开始！明白警察统治的结束指日可待！我们就是要对他们说，我们正在建立红军，这是他们的军队。我们要对他们说：“已经开始了。”他们不会提出“为什么是现在?”这样愚蠢的问题。他们已经走过了千百条被当局和管理者控制的道路——他们已经在等候间里跳过华尔兹了；他们还记得什么情况有用，什么情况没用。而在与有同情心的教师的对话中，他们被分配到什么都改变不了的辅导学校和缺乏必要空间的幼儿园——他们可不会问为什么是现在——该死的！

1 被剥夺公民权的年轻人所在的地方。红军派成员以前曾在“学徒集体”中与这些被被边缘化的青年合作过。其中一些年轻人成为了红军派的成员，并参与了解放巴德尔的行动。

如果你在报纸被没收之前，连报纸都无法发行，他们当然不会听你的。因为你不需要撼动左翼里面吃屎的人，而是要撼动有目标左派，你必须建立一个分发活动网，让脏猪（指统治者）无法触及。

不要抱怨太难了。解救巴德尔的行动可不是简单事。如果你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的评论表明你确实明白了，所以你要是说子弹也打中了你的胃，2这就是机会主义——你们这些混蛋)，如果你明白任何一点东西，你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组织发放报纸的活动。关于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没有什么话对你们说，也没有什么话对你们说——你们这些白痴！只要你允许自己被警察抓进监狱，你就没有资格给其他人提供如何避免被警察抓走的建议。你说的冒险主义是什么意思？有告密者只能怪你自己。管他呢。

让冲突达到顶点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允许自己脱离行动。

这就是我们建立红军的原因。家长的背后站着老师、少管所、警察。主管的背后站着老板、人事处、工伤赔偿局、福利处和警察。看门人背后站着经理、房东、法警、驱逐通知书和警察。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脏猪们采用了审查制度、裁员、解雇、法警印章和警棍等手段。显然，他们拿起了军用左轮手枪、催泪弹、手榴弹和半自动武器；显然，如果别无他法，他们会升级手段。3显然，在越南的大兵都接受过反游击战术的训练，绿色贝雷帽也接受过酷刑的课程。那又怎样？

2 指的是Georg Linke，他是社会研究机构里64岁的图书管理员，在解救巴德尔的行动中被枪杀。这次枪击事件导致了大量的批评，即使是原本同情的左派人士也进行了批评。

3 指的是巴德尔越狱后不久通过的《手榴弹法令》，根据该法令，西柏林的警察配备了手榴弹、半自动左轮和冲锋枪。

很明显，对政治活动的监禁刑罚已经变重了。你必须明确的是，如果帝国主义——和它所有的诺伊鲍尔们4和韦斯特莫兰们5，波恩、参议院、州青年办公室、自治区委员会，这整栋猪圈——都能允许在不进行斗争的情况下被颠覆、调查、伏击、恐吓和压制，这绝对是社民主义式扯淡。要绝对清楚，革命不是复活节游行。猪当然会尽可能地升级他们的手段，但不会再进一步了。为了把冲突推向高潮，我们正在建设红军。

如果不同时建立红军，那么，所有在工厂里、在威丁（Wedding）6、在麦基施(Märkisch)街区7、在普勒策（Plötze）8以及在法庭上进行的所有冲突、所有的政治工作，都会沦为改良主义；也就是说，你最终会得到改进的纪律，改进的恐吓，改进的剥削。那是毁灭人民，而不是毁灭毁掉人民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建立红军，脏猪就可以为所欲为，脏猪就可以继续监禁、解雇、扣押、抓捕儿童、恐吓、开枪、统治。让冲突达到顶点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做他们想做的事，而是必须做我们想让他们做的事。

4 库尔特·诺伊鲍尔（Kurt Neubauer）是SPD成员，柏林的青年和体育事务参议员（Senator for youth and Sports）。

5 威廉·韦斯特莫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是1964年至1968年驻越南美军的指挥官，1968年至1972年任陆军参谋长。

6 西柏林的一个街区。

7 西柏林的一个工人阶级郊区。

8 位于普勒岑西（Plötzensee）的女子监狱。

你必须明白，那些从对第三世界、波斯石油、玻利维亚香蕉、南非黄金的剥削中一无所获的人，本就没有理由认同剥削者。他们可以理解，这里开始发生的事情，在越南，在巴勒斯坦，在危地马拉，在奥克兰和瓦茨，在古巴和中国，在安哥拉和纽约，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

如果你向他们解释，他们就会明白，解救巴德尔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行动，从来都不是，但这只是德国联邦共和国的第一次。该死的。

别再窝在你最近被洗劫过的公寓的沙发上，细数你的情事和其他小事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分发网络吧。忘掉那些懦夫、马屁精、社会工作者、那些只想巴结人的人吧，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弄清楚收容所在哪里，还有那些大家庭，那些地位次于无产阶级的人（subproletariat）和女工，那些只是在等待着给欠踹的人嘴上来一脚的人们。他们将起带头作用。不要让自己被抓住。向他们学习如何避免被抓——他们比你知道得更多。

**发展阶级斗争**

**组织无产阶级**

**开始武装斗争**

**建立红军！**

RAF

1970年6月5日



标语：建立红军！

城市游击概念

“必须分清敌我。”

——毛泽东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1

1.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回答

“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

有些同志已经对我们拿定了主意。对他们来说，正是“资产阶级媒体的蛊惑人心”将这些“无政府主义团体”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在他们对无政府主义一词的不正确和贬义的使用上，他们与施普林格出版社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想在这样不讲理的基础上与任何人进行对话。

许多同志想知道我们认为我们在做什么。1970年5月写给883报社的信太模糊了。米谢勒·蕾所掌握的录音带（其摘录已经出现在《明镜》杂志上）并不是真实的，而且无论如何，它是从一次私人讨论中摘取的。蕾想用它作为她正在写的一篇文章的备忘录。不是她欺骗了我们，就是我们高估了她。如果我们的做法像她所说的那样草率，我们现在早就被抓了。《明镜》给了蕾1000美元的采访酬金。

报纸上几乎所有关于我们的报道，以及他们的写法，显然都是谎言。绑架维利·勃兰特的计划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像政治白痴，说我们打算绑架儿童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像无良的罪犯。这些谎言与konkret第5号杂志中的“真实细节”一样，被证明只是一些不可靠的细节，是被拼凑出来的。说我们有“军官和士兵”，说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别人的奴隶，说离开我们的同志害怕被报复，说我们入室抢夺或使用暴力夺取护照，说我们实行“群体恐怖”——所有这些都是扯淡。

那些把非法武装组织想象成自由军团或菲默法庭2的人，是那些希望进行大屠杀的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权威人格》和赖希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中分析了产生这种投射的心理机制及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强迫性的革命人格是一种*语词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这个术语表示一种矛盾性。在目前的条件下——也许在任何条件下，革命的政治实践都假定个人的性格和政治信仰，也就是政治认同的永久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与“自我解放”无关，但与革命纪律有很大关系。不是那些匿名或使用笔名写作的“左派组织”的成员，他们只是对“成为头条新闻”感兴趣，而是konkret自己本身，它的编辑目前正在宣传自己是某种左翼的爱德华·齐默尔曼3（Eduard Zimmermann），为他的市场空白制作自慰材料。

1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 Tung* (外文出版社出版(北京), 1966)

2 自由军团（Freikorps）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右翼准军事组织；许多人后来加入了掌权的纳粹势力。菲默（Feme）是一个中世纪的秘密法庭，负责执行死刑，受害者的尸体通常被悬挂在街上。

3 齐默尔曼是相当于德国版《犯罪观察》（Crimewatch，BBC节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被用于搜寻红军派成员。

许多同志也散布我们的不实之词。他们吹嘘我们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组织了我们的约旦之行，他们知道我们的联络人，他们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而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有些人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像“知情者”。金特·福格特4不得不为自己与迪伦马特5（Dürrenmatt）谈话中的自我膨胀付出代价，他声称是他释放了巴德尔，当警察出现时，他后悔了。用否认的方式来澄清事情并不容易，即使这些否认是真的。有些人想用这些谎言来证明我们是愚蠢的、不可靠的、粗心大意的，或者是疯狂的。他们这样做，是想鼓励人们反对我们。实际上，他们与我们无关。他们只是消费者。我们不想和这些闲言碎语的人有任何关系，对他们来说，反帝国主义斗争就是喝咖啡闲聊而已。还有许多人是那些不说闲话的人，那些对抵抗有一定理解的人，那些感到生气，希望我们好运的人，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把生命耗费到这些垃圾上并适应它们没有一点意义。

在克内泽贝克大街（Knesebekstr）89号房子里发生的事情（指马勒被捕）不是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而是因为背叛。叛徒是我们中的一员。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人，不能保证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确定同志们会不会在警察的极度压力下崩溃，也不确定同志们在这个体制针对我们使用、用来攻击我们的恐怖手段面前能够坚持到底。脏猪如果不用这些手段，就不会有力量。

我们的存在让一些人感到压力，为自己辩解。为了避免与我们进行政治讨论，为了避免将他们的做法与我们的做法进行比较，他们甚至歪曲了最小的细节。例如，现在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巴德尔只有3个月或9个月或12个月的刑期，尽管正确的刑期很容易确定：纵火罪3年，还有6个月的缓刑，伪造文件罪约6个月。在这48个月中，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在黑森州10个不同的监狱中服了14个月的刑——有9次是因为行为恶劣，例如组织抗命和反抗而被转移。将剩下的34个月缩短为3个月、9个月或12个月，是为了减少5月14日劫囚的道德正当性。这样，有些同志就把害怕与我们进行政治讨论导致什么个人后果给合理化了。

3金特·福格特是西柏林的军火商。在解救巴德尔行动期间，一支可能与他有关的手枪被丢弃。福格特逃到了瑞士，在那里他接受了一次采访，导致了他的被捕，他声称自己参与了巴德尔的解放。

4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是瑞士剧作家和散文家。

经常有人问，如果我们知道林克会被枪击，我们会不会继续劫囚计划，这个问题只能用“不会”来回答。如果怎样怎样，那么我们会做什么，这种问题问得含糊不清——和平主义的、道德主义的、柏拉图式的并且脱离实际。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突围问题的人，都不会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会自己想清楚。在问这个问题时，人们只想看看我们是否像施普林格出版社所说的那样残酷。这就像基督教慕道课上的盘问一样。这是把革命的暴力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混为一谈，企图把革命暴力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这样做没有任何结果。鉴于所有可能的事态发展，没有理由相信会有平民介入。认为一个人可以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执行越狱，这是在自投罗网。

5月14日，警察开了第一枪。在法兰克福也是如此，当时我们有两个人跑了，因为我们不会就这样让自己被逮捕。警察开枪是为了杀人。有时我们根本没有开枪，而当我们开枪时，我们并不是为了杀人而开枪。在柏林，在纽伦堡，在法兰克福。1都可以证明，因为这是真的。我们没有“鲁莽地使用枪支”。那发现自己处于矛盾中，既是“小人物”，又是资本主义的走卒、低薪雇员和垄断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警察，他没有义务服从命令。如果有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就还击。放我们走的警察，我们也放过他。

很明显，对我们的大规模追捕实际上是针对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的整个社会主义左派。我们被指控偷了少量的钱，几辆车和文件，或者他们对我们的谋杀企图，这些都不能证明他们有必要采取这么热闹的大规模行动。统治阶级已被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以为他们早已控制了这个国家和它的所有居民、阶级和矛盾，直到最后的细枝末节：知识分子躲进他们杂志的象牙塔中，左派被孤立在自己的圈子里，马列主义被解除了武装，国际主义士气被瓦解。无论它装得多么脆弱，权力结构都不是那么容易被破坏的。人们不应该被这种叫嚣所欺骗，成为这噪音的一部分。

不是说武装抵抗组织可以取代合法的无产阶级组织，不是说孤立的行动可以取代阶级斗争，也不是说武装斗争可以取代工厂或居民区的政治工作。我们认为，武装斗争是后者成功和进步的必要前提，武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形式”（毛主席语，原话：“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它现在可以而且必须开始，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在大城市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我们认为布朗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也无可非议。

我们甚至还没有活动一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根舍尔、齐默尔曼2及其他成员的广泛宣传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宣传机会，我们正借此机会来分享一些想法。

1 柏林指的是上面提到的在克内泽贝克大街对马勒的逮捕。1971年12月21日，红军派成员阿里·扬森在纽伦堡的警察路障附近交火后被捕。1971年2月10日，法兰克福警方向阿斯特丽德·普罗尔和曼弗雷德·格拉斯霍夫开枪，他们毫发无伤地逃脱了。

2 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Friedrich Zimmermann）（CDU）此时是议会中基民盟/基社盟派别的主席。

2.大城市：封建共和国

“危机不是发展停滞的结果，而是发展本身的结果。由于其目的是增加利润，发展鼓励寄生和浪费，损害整个社会各部分，使无法满足的需求成倍增加，并加速社会生活的解体。必须有一个畸形的机器，通过操纵和公开镇压的手段，来控制它本身经常引发的紧张局势和反抗。学生暴动和黑人运动引起的美国政治团结危机，欧洲学生斗争的蔓延，导致法国‘五月风暴’爆发的工人和群众斗争的激烈更新和发展，意大利动荡的社会危机，以及德国不满情绪的重生，都表明了这种情况的性质。”

《宣言》：

《共产主义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Communism*），摘自第33篇文章1

1 1969年被意大利共产党开除的“宣言派”（Il Manifesto）是意大利自治运动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团体，1972年有6000名成员。他们主张委员会共产主义，即由工人委员会而不是先锋党或国家作出决定。“宣言派”对整个欧洲新左派影响极大。这段话出自该组织1971年发表一份包含200篇论文的宣言。

宣言派的同志们正确地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放在最后，含糊地把这里的情况描述为不满。六年前，巴策尔1将西德形容为经济巨人，但政治上却是侏儒。自那以来。自那以来，西德的经济实力从未衰退过，而其外部和内部的政治实力也都有所增强。随着1966年大联合政府的成立，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政治危险得到了遏制。《紧急状态法》的实施是为了在未来发生危机时确保统一的统治阶级行动——政治反动派和所有坚持合法性的人的团结得到确立。社会自由联盟取得了成功，消除了在学生和议会外运动中变得明显的“不满情绪”。只要SPD的支持者没有与改良主义决裂，这部分知识分子就无法接受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这样一来，改良主义就对反资本主义斗争起了刹车作用。“东方政策”为资本主义开辟了新的市场，同时也代表了德国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调解与联合的贡献，这为美国在第三世界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所必需的自由。这个政府似乎已经成功地将新左派与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分离开来，将新左派与它自己的历史——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隔绝开来。DKP可以感谢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之间新的勾结，这使其获得新的法律地位。DKP已经组织了支持这个政府的“东方政策”的游行。尼莫拉（Niemöller）——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为SPD摇旗呐喊。

利用“共同利益”的烟幕，政府建立了国家控制，并通过其工资指导方针和协同行动的概念来约束工会官僚机构。1969年9月的罢工表明，事情已经压倒性地向利润倾斜；而这些罢工只解决了经济问题的事实表明，政府是多么牢固地掌握着控制权。

拥有200万外国工人、失业率接近10%的联邦共和国，可以利用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用失业来形成对无产阶级而言的恐怖主义和纪律措施，而不必对付群众的任何政治激进化，这个体系的力量就在于此。

作为对美国侵略战争的发展援助和军事支持的交换，联邦共和国从第三世界的剥削中获利，而不必为这些战争承担责任，也不必与内部反对派斗争。虽然它的侵略程度不亚于美帝国主义，但联邦共和国却不比美帝脆弱。

帝国主义在这里可以选择的政治方案无论是改良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形式都没有用尽，帝国主义也没有用尽统合或压镇压由它产生的矛盾的能力。

红军派的城市游击概念不是建立在对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局势的乐观评估之上的。

1 莱纳·巴策尔，当时CDU的党主席

3.学生暴动

把学生运动斥为小资产阶级反抗，就是把它贬低为与之相伴的浮夸主张，否认它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承认其明显缺点，而忽视这种反资本主义抗议所可能达到的理论水平。

当学生运动意识到它在知识工厂里的精神贫困时，他们的悲情自然被夸大了，同样被夸大的还有人们把这种悲情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被剥削人民处境的相提并论。把《图片报》的大量发行与越南的大规模轰炸进行比较，是一种荒唐的过度简化，就像把对这里制度的思想批判和那边的武装斗争相提并论是傲慢的。学生们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主体，仅因为这是基于马尔库塞的呼吁，这暴露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性质和它所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无知。

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的学生暴动——包括街头打斗、纵火、报复性暴力、他们的悲情、夸张和无知……总之，它的实践——有一个优点，就是重新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因为没有这种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外在表现就不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全面的分析视角。没有这一点，就无法描述内部和外部的关系。

学生运动是建立在学术自由的理论与垄断资本主义控制着大学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之上的。正因为它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所以，在它建立起大学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关系之前，它没有丧失动力，即使这只是从理论上讲。在此之前，学生运动及其公众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靠呼吁人权或联合国宪章就能实现，这里所发生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的剥削所一直发生的：被压迫者、对那些通过抗议进行斗争的人、那些反抗和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人施行的纪律、服从和残暴。

在其意识形态批判中，学生运动几乎把国家镇压的所有方面都看作是帝国主义剥削的表现：在施普林格运动中，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中，在反对阶级正确的运动中，在联邦国防军运动中1，在反对《紧急状态法》的运动中，在高中生运动中。没收斯普林格！粉碎北约！抵制消费恐怖！抵制教育恐怖！抵制房租恐怖！——这些都是正确的政治口号。它们的目的是要揭露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满足的新需求与另一方面不合理的服从阶级社会的压力之间的矛盾。它们的身份不是基于这里的阶级斗争，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是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所面对的是和越共面对的一样的阶级敌人，一样的纸老虎，一样的猪。

1 SDS发起的一场鼓励西德国防军士兵从军队逃跑的运动

学生运动的第二个优点是它突破了老左的狭隘主义：老左以复活节游行、德国和平联盟、德国的人民日报（Volkszeitung）等为形式的人民阵线策略，对在某次选举中取得“大规模压倒性胜利”的不合理希望，议会对这里的施特劳或那里的海涅曼的偏执，他们对GDR支持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犹豫不决，他们的孤立，他们的顺从和他们的道德冲突：准备好了每一次牺牲，却无实践能力。学生运动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尽管有理论上的错误，但还是发展了自己的意识，因为他们正确认识到“西方的革命主动性可以建立在全球力量平衡危机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在旧国家中新力量的发展上。”（《宣言》，第55篇）他们的鼓动和宣传建立在可被认为是德国现实中最重要的方面。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把民族斗争国际化，在斗争的民族方面和国际方面之间，在传统斗争形式和国际革命的积极活动之间建立联系。他们成功地将自己的弱点转化为力量，因为他们认识到，在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现存的前法西斯主义条件下，持续的顺从、狭隘主义、改良主义和人民阵线策略只会导致社会主义政治走向死路。

左派知道，把在工厂传播社会主义宣传物与实际阻止《图片报》的散发传播联系起来是正确的。把反对把美国大兵派往越南的宣传与实际袭击参与越战的军机联系起来，以及将对国防军的行动与针对北约机场的攻击联系起来，是正确的。将对阶级正确的批判与炸毁监狱围墙、对施普林格公司的批判与解除其私人安保部门的武装联系起来是正确的。设立无线电台，打击警察的士气，为德国国防军的逃兵提供安全庇护所，将鼓动外国工人与制作假文件结合起来，破坏兵工厂阻止生产凝固汽油弹，这些做法是正确的。

然而，他们让自己的宣传依赖于供求关系是错误的：如果工人们不能提供资金，他们就将没有报纸看；如果“运动”不能承担得起，他们就将没有汽车使用；因为他们没有执照，所以他们没有发送武器；如果资本主义不会因此而立马崩溃，他们就不搞破坏活动。

当学生运动中的典型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反专制主义”证明自己不适合实现其目标时，学生运动就崩溃了。它的自发性在工厂里被证明是无效的，它也不能创造一个有效的城市游击运动或社会主义群众组织。与意大利和法国不同，这里学生运动的火花未能点燃阶级斗争的燎原之火，就在那时，它崩溃了。它可以列举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和内容，但它不能成为革命主体，不能提供必要的组织结构。

红军派与新左派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同，它并不否认自己根源于学生运动的历史。学生运动重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并为大城市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国际基础。

4. 实践的首要地位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

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实践论》，毛泽东

作为学生运动的权威人物，左翼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决定转向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将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转变为对学生运动的自我批判，这同时也是退回到课堂的决定。考虑到他们的论文产出、组织模式和轰轰烈烈的言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革命者正在领导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仿佛1967/68年是德国社会主义的1905年。1903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俄国工人需要一种具体的理论，并提出，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相对立地，阶级分析、组织和全方位的宣传存在必要性，因为一场基础广泛的阶级斗争正在展开：

“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

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现有条件下，我们怀疑能否制定一个团结工人阶级的战略，或者建立一个能够同时表达和发起必要的团结进程的组织。我们怀疑，从无产阶级组织提出的政治纲领或宣言中能否“塑造”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团结。以恐怖为基础的水滴和细流早已被施普林格公司收集起来，然后他们又在其中加上新的恐怖。

我们认为，没有革命的主动性，没有先锋队、社会主义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实际革命干预，没有具体的反帝斗争，就不会有团结的过程。团结只能通过工人阶级有觉悟的部分和知识分子的共同斗争来创造，这种斗争不是精密策划的，而是由他们来示范的，否则就根本不会发生。

这些组织的论文产出表明，他们的实践主要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比赛，在一个假想的评委会面前争夺最好的马克思评论，而这个评委会不可能是工人阶级，因为所用的语言排除了他们的参与。他们在实践中被发现错误的引用马克思时，比被发现撒谎时更尴尬。讲话就是他们的实践。他们脚注中的页码几乎都是正确的，他们给自己组织定的成员人数很少是正确的。比起资产阶级职业的腐败，他们更害怕革命不耐烦的指责。对他们来说，花数年时间在卢卡奇1那里攻读学位比让自己自发地受到布朗基的启发更重要。他们以审查的形式表达国际主义，偏爱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而不是另一个。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真正捍卫者的白人大手子们，通过赞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黑豹党的名义向他们有钱的朋友乞求施舍——这不是为了“人民战争的胜利”，而是为了安抚他们的良心。这不是一种革命的干预方法。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革命和反革命进行了这样的对比：

“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毛主席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对红旗和白旗的立场来区分阶级。对他来说，仅仅分析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是不够的。他的阶级分析有一部分涉及到不同阶级与革命的关系。如果先锋队不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如果先锋队不能回答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如何打破资产阶级力量的问题，不准备做任何事情来回答这些问题，那么马列主义者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中就没有领导作用。我们所要求的阶级分析，如果没有革命的实践或革命的主动性，就得不到发展。

全国各地无产阶级组织提出的“临时革命要求”——如反对剥削加剧的斗争，争取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反对社会财富的挥霍，争取男性、女性和外国人的工资平等，反对生产定额等等——只要不想着怎么打破在群众阶级斗争中提出这些要求时，总是牢固地挡在这些要求前面的政治、军事和宣传力量，那么这些要求就只是工会经济主义。如果这些要求一成不变，人们只能说它们是经济主义的狗屎，因为它们不值得浪费革命精力去争取，并且它们不会导致胜利，如果“胜利意味着接受生命对革命者来说不是最宝贵的东西这一原则”（德布雷）。工会以这样的要求进行干预——但“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列宁）。这不是一种革命的干预方法。

无产阶级组织没有把武装斗争的问题作为对《紧急状态法》、军队、BGS、警察或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回应。这说明，这些无产阶级组织的机会主义与DKP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们更不扎根于群众，即使它们在口头上更激进，在理论上更先进。实际上，他们在公民权利的层面上运作，关心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人气。他们支持资产阶级的谎言，支持这样一种想法，即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可以通过议会手段来纠正社会问题。他们鼓励无产阶级参加没有成功机会的斗争，因为国家有能力使用暴力和野蛮的方式。“这些马列主义派别或政党，”德布雷2在关于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写道，“在政治环境中活动，仿佛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控制着。他们不是挑战政治现状，而是强化它......”

这些组织没有为成千上万的学徒和年轻人提供任何选择，这些人由于被学生运动政治化，下定决心要结束他们所在工作场所的剥削。这些组织只是建议他们适应资本主义剥削。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说到底，这些组织和监狱长的立场是一样的。对于监狱里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和法官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地下组织，他们和社会工作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没有政治实践，读《资本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没有政治实践，政治纲领不过是胡扯。没有政治实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是空话。在理论上采取无产阶级立场，就意味着要把它付诸实践。

红军派主张实践是第一位的。现在组织武装反抗是否正确，要看是否可能，而是否可能只能在实践中确定。

1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e Lukacs）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他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左派。

2 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是焦点主义理论的支持者，该理论认为一小群游击队可以作为革命活动的激励源泉。他与切·格瓦拉一起踏上了那注定要失败的玻利维亚之旅。

5.城市游击队

“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1958.1.12

如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就意味着，归根结底，它是可以被打败的。而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战胜美帝国主义是可能的，因为全世界都爆发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的力量被分散了。正是这种分散使它的失败成为可能。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就没有理由仅仅因为革命的力量特别弱小，反动的力量特别强大，就把任何国家或地区排除或遗漏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之外。

如果低估革命力量而使其士气低落是不正确的，那么把它们推向只能导致失败的对抗同样是不正确的。在无产阶级组织中的诚实同志——这不包括那些说大话的人——和红军派之间的冲突中，我们指责他们挫伤了革命力量的士气，而他们却觉得我们把革命力量引向了死胡同。有人想弥合工厂跟居民区的同志与红军派之间的这种隔阂，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得出真理。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任何国家在革命运动薄弱时期的典型偏差。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机会主义最强烈的批评者，所以任何批评机会主义的人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这只不过是流行的无稽之谈。

城市游击队的概念来自拉丁美洲。在那里，和这里一样，它是一般弱小的革命力量进行革命干预的方法。

城市游击斗争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的，即不会有普鲁士式的行军命令，而许多所谓的革命者都在等着这样的命令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即当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时，再为武装斗争做准备已经太晚了。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在一个像联邦共和国这样有暴力倾向的国家，如果没有革命的主动行动，当革命斗争的条件比较有利的时候，也不会有革命的方向，因为不久就会出现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城市游击队是长期以来民选代表自己完全否定议会民主的结果。这是对《紧急状态法》和《手榴弹法》的必然回应。它是一种与体制特别据为己有用来打击敌人的手段进行斗争的意愿。城市游击队员的基础是面对现实，而不是为现实找借口。

学生运动已经对城市游击队所能达到的目标有了部分的认识。它可以给已经沦落到鼓动和宣传工作的左派提供具体的工作形式。例如，在施普林格运动中，在海德堡学生的卡布拉·巴萨运动1中，在法兰克福的占屋运动中，在联邦共和国给予非洲买办政权的军事援助中，在工厂的安保措施和内部法令执行中。城市游击队可以通过提供武器和金钱使口头上的国际主义具体化。它可以通过组织一个能躲避警察的地下组织来削弱体制的武器和对共产党的禁令。城市游击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武器。

1 阻止在莫桑比克（当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建造大型水坝的运动。右翼的葡萄牙政府计划在这个非洲国家安置100多万欧洲殖民者。到1969年，五家德国公司被牵连到这个项目中。当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问联邦德国时，在联邦德国国内，特别是在海德堡，发生了反对该计划的抗议活动。

城市游击斗争是在警察肆意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在阶级正确认定库拉斯无罪并活埋同志的情况下进行的武装斗争。城市游击战意味着不会被体制的暴力摧毁斗志。

城市游击队的目标是摧毁国家体制的某些方面，打破国家无所不能和无懈可击的神话。

城市游击队需要组织非法的体系安排，包括安全屋、武器、汽车和文件。对此需要知道什么，马里盖拉（Marighella）在他的《城市游击队迷你手册》（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illa）中进行了描述。除此之外还需要知道的，我们随时准备告诉任何想要参与游击斗争的人。我们还不知道那么多，但我们至少知道一点。

在决定进行武装斗争之前，首先经历法律斗争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与革命左派的联系仅仅是建立在想追随新潮流的想法上时，那么最好不要开始任何之后你无法摆脱的事情。

红军派和城市游击队代表的是唯一一个在我们自己与敌人之间划清界限的派别和实践，因此受到的攻击也是最尖锐的。这就要求一个人要有一个政治身份，因此我们假定他已经有了一个学习过程。

我们最初的组织概念意味着城市游击队和基层工作之间的联系。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街区、工厂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团体中工作，受到正在进行的讨论的影响，有一些经验，去进行学习。很明显，这是行不通的。政治警察对这些团体，对他们的会议，他们的职位，他们讨论内容的监视已经非常广泛，如果想逃脱这种监控，就必须远离。

城市游击队斗争要求人们完全明确自己的动机，不要被《图片报》的攻击所吓倒，他们给革命者贴上的反犹太主义-罪犯-非人类-杀人犯-纵火犯的标签。他们吐出的那些狗屁话，愿意说的那些话，还影响着许多同志对我们的看法，必须对我们没有作用。

当然，这个体制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他们没有什么不会做，没有什么诽谤不会用来对付我们。

没有任何出版物的目标可以与为资本利益服务的目标分离。还没有一种社会主义出版物能够超越自身，超越自己的圈子，超越那些手抄传阅它的人们、它的订阅者们，它也根本不存在于偶然的、私人的、个人的、资产阶级的环境中。所有形式的媒体都被资本控制着，通过广告销售，这是作家们的野心的结果，他们想通过广播电台的董事会，通过媒体公司的市场控制，他们想通过写作进入体制。主流出版物是统治阶级的出版物。他们在自我内部划分市场机会，为特定的环境发展意识形态，他们出版的东西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市场支配权。新闻业就是为了一件事：销售。新闻是一种商品，信息是一种消费品。凡是不适合消费的，都会被打回去。广告密集的出版物需要留住读者，电视的积分制收视率，防止这些媒体和公众之间形成对抗性矛盾；没有对立，就没有后果。谁要想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与这些极其强大的舆论塑造者保持联系。这就意味着，对施普林格公司的依赖随着施普林格本身的发展而增长，施普林格公司也已经开始收购地方报纸。城市游击队只能期待来自这些公众的苦涩的敌意。它必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定位，而不是其他。正如毛泽东所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长期、细致的工作对城市游击队来说至关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超越讨论而付诸行动。如果没有一条能退缩回中产阶级职业的道路，如果不是一直惦记着丢下革命跑去住大房子，如果这一切甚至都无法让人向往，那么，用布朗基的话十分感慨地说：“革命的责任是永远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斗争到死。”没有哪一次革命斗争，也不曾有哪一次革命斗争，不表现出这一点。俄国，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越南都是如此。

有人说，组织、鼓动、宣传的政治可能性远未穷尽，只有当这些可能性穷尽时，才应该考虑武装斗争。我们说，在承认武装斗争就是政治目标之前，只要不掌握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结论，就算能在战术上得出他们是罪犯、杀人犯和剥削者的结论，所有政治上的可能性也不会得到充分利用。

我们不会空谈“武装宣传”：我们会这么做。制造越狱事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真把那个家伙弄出来。他们想摆出来我们在家门口制造银行抢劫案的样子，但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抢钱。毛泽东告诉我们，如果“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我们一定会“工作是很有成绩的”，这也将不是我们独自的成功。关于我们的吵闹与呼声更多的是由于拉丁美洲的同志们——考虑到他们早就在自己和敌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些吵闹已经让这里的统治阶级“积极地反对”我们，他们怀疑我们将搞些银行抢劫，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这里建立：以红军派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城市游击队。

6.合法与非法

“西方的革命，即对资本主义势力在其大本营的挑战，在当今是普遍存在的。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的世界局势没有任何地方和力量能够保证和平发展与民主稳定。危机正在加剧。狭隘主义或推迟斗争的决定将意味着陷入彻底失败的深渊。”

——《宣言》，摘自第55篇文章

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是“毁掉摧毁你的东西”，目的是动员基层，即监狱、教养所、高中和培训中心的年轻人。它的对象是所有处于最糟糕境地的人。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自发地理解，是对直接反抗的呼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1的“黑人的力量”的口号：“相信自己的经验！”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口号是基于这样一种见解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任何压迫、折磨、约束和负担的都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每一个压迫者，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资本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使他成为阶级敌人。

1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著名的激进分子，在全国学生非暴力协会（SNCC）和后来的黑豹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在这种程度上，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是正确的，是无产阶级的，是符合阶级斗争的。仅就它导致错误意识而言，它是不正确的。一个人去进攻，只是为了给他们来一脚，那么组织将居于次要地位，纪律就成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析就成了多余的。如果不从组织的角度搞清楚合法与非法的辩证关系，你将无力抵抗随之而来的严密镇压，你将被合法地逮捕。

有些组织说，“共产党还没蠢到把自己弄到被禁止的地步”，这种话使他们成为阶级正确的喉舌，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这话是正确的，因为它的意思是说，必须充分利用共产主义鼓动、宣传和组织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法律可能性，而且不能被随意破坏这种法律上的可能性——但这不是他们实际的意思。他们的意思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绕过阶级国家及其司法制度为社会主义计划所设立的限制，人们必须在这些界限上停下来，必须从国家的非法侵占面前退却，因为这些侵占是合法的，（国家）不计代价的将其合法化。非法监禁，恐怖主义判决，警察骚扰，敲诈胁迫——吃屎或者去死二选一——共产主义者可没那么傻……

而这种说法是机会主义。这表明缺乏团结。它抛弃了监狱里的同志。它将任何由于其社会背景和处境而不得不通过犯罪生存的人，即地下组织、次无产阶级、无数的无产阶级青年和外来工人，把他们排除在对其在社会主义环境下进行组织和政治化的活动之外。它为对所有不是这些组织成员的人在理论上确定罪名提供了便利。它表示出对阶级正确的共谋。这很蠢。

合法性是一个权力问题。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考察改良派和法西斯统治之间的矛盾来确定，在波恩，改良派一方的代表是社会自由联盟，另一方是巴策尔和施特劳斯。前者的媒体代表是：《南德意志报》(Suddeutsche Zeitung)、《明星报》(Stern)、西德广播公司第三期节目(WDR Third Program)、SFB（此处SFB与下文自由德国广播电台重复，可能为笔误——译注）和《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后者是：施普林格公司、自由柏林广播电视台（Sender Freies Berlin）、德国电视二台（ZDF）、巴伐利亚信使报（Bayernkurier）。这边是慕尼黑警察的警戒线，那边是柏林模式。这边是联邦行政法院的法官，那边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改良派的路线试图通过以下方式避免冲突：使用制度选择权(共同管理)和承诺改善(例如监狱条件)来避免冲突，解决过时的冲突来源（例如勃兰特在波兰下跪），避免挑衅（例如慕尼黑警察和柏林联邦行政法院的软线），以及表达不满（例如关于黑森和柏林的公共教育）。作为这种避免冲突的改良主义路线的一部分，他们在合法范围内走得更远一些，在合法范围外走得更近一些。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显得合法。有了宪法，他们打算中和矛盾，让左翼的批评死气沉沉，内容空洞，从而把SPD的青年党部（Jusos）部留在党内。

从长远来看，改良主义路线是稳定资本主义统治的更有效途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需要经济繁荣，因为慕尼黑警察的怀柔路线比柏林的强硬路线要昂贵得多——正如慕尼黑警察局长所指出的：“两名手持机关枪的警察就能镇住一千人。100个拿着警棍的警察可以控制一千人。如果没有这些武器，就需要300或400名警察。”改良主义的路线要求不存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反对者的情况，从慕尼黑的例子可以看出。

在政治改良主义的伪装下，国家和经济权力加速集中。席勒的金融政策和施特劳斯的金融改革所推动的，是通过生产部门的强化工作和高度分工，以及通过行政部门和服务行业的长期精简化来增加剥削。

如果悄悄地进行，如果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这种挑衅可以推动团结的进程），暴力权力就可以不受反对地慢慢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是在学生运动和巴黎五月风暴的结果中得到的教训。因此，“红色细胞”还没有被禁止。因此，在没有解除对共产党的禁令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作为DKP而存在。因此，仍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电视节目。因此，一些组织可以侥幸地认为他们并不像他们实际上那么蠢。

改良主义所提供的合法性余地，是资本对学生运动和APO的攻击的反应——只要他们能控制住它，改良主义的回应将是更有效的回应。依靠这种合法性，指望它，形而上地延续它，以它为基础进行统计预测，想要捍卫它，意味着重复拉丁美洲自我防卫区的错误。这意味着你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却给了反动派重整旗鼓的时间，创造了他们不会禁止左派，但会摧毁左派的局面。

威利·魏尔1不玩弄容忍。当自由派媒体抱怨他的高速公路呼气检测仪把所有司机都当成潜在罪犯时，他耍了个手腕，大胆地回应：“我们将继续下去！” ——他这样做表明了自由派公众的无关紧要。爱德华·齐默尔曼创造了整个警察国家，施普林格公司承担了领导柏林警察的角色——《图片报》的专栏作家雷尔（Reer）向拘留法官推荐被逮捕者。支持法西斯主义，支持镇压，支持死刑，支持更多更好的武装警察的大规模动员有增无减——勃兰特-海涅曼-谢尔政府的新形象是波恩政策的门面。

那些仅仅肤浅地处理合法性和非法性问题的同志，显然误解了这将要驯服学生运动的赦免。他们在赦免几百名学生的刑事罪名时，就唬了一下他们就把人撵走了，这防止了他们进一步的激进化，并向他们灌输了当一个资产阶级学生所享有的特权的价值——尽管有着知识工厂这样的性质，但大学对社会奋斗逼还是有帮助的。这就加深了学生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鸿沟，扩大了他们的优越的日常生活和那些干活累成狗的，却没有被同样的阶级敌人所同样赦免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割裂又一次得到了维护。这个等式就是：赦免等于招安。

社会民主选民倡议包括一些受人尊敬的作家——不仅仅是那个操蛋的格拉斯2——是一种积极的、民主的动员的尝试，而且是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因此不轻率地不予考虑。它对某些出版商和广播电视编辑部所呈现的事实报道产生了影响，这些出版商和广电编辑部门还没有屈服于垄断的逻辑，还没有被上层建筑所吸收，这些上层建筑有着无处不在的政治现实。压迫越来越多的领域通常不是作家们关心的领域：监狱、阶级正确、加大工作强度、工伤事故、分期付款、学校、《图片报》和《柏林报》（Berliner Zeitung）、郊区的兵营式住房3、外国人的贫民窟——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审美上而非政治上困扰着这些作家。

1 SPD的威利·魏尔（Willy Weyer）当时是北威州的内政部长，也是警察部队军事化的主要支持者。

2 君特·格拉斯当时是“四七社”（Gruppe 47）的成员，是二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

3 与北美不同，欧洲北部的郊区一般都是由次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和低工资的移民工人占据。

合法性是议会主义、社会伙伴关系和多元社会的意识形态。当那些坚持合法性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电话被合法窃听、邮件被合法监控、邻居被合法审问、警方线人被合法雇佣时，合法性就成了一种迷信。政治工作的组织活动，如果没有政治警察的高强度监视，就必须合法与非法同时进行。

我们不指望恐怖和法西斯主义会引发自发的反法西斯动员，我们也不认为合法的总是腐败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借口，就像司机的酒精对威利·魏尔，就像犯罪率上升对施特劳斯，东方政策对于巴策尔，南斯拉夫人闯红灯对于法兰克福出租车司机，像口袋里的工具对于杀害柏林偷车贼的人的作用一样。至于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而生出的其他说辞，共产党人是否要组织起来并进行斗争，这将取决于恐怖和镇压是否只会产生恐惧和屈从，还是会产生抵抗、阶级仇恨和团结，以及还要看帝国主义是否顺风顺水。这也要看共产党人是否愚蠢到能忍受对他们的一切行为，还要看他们是否会用合法手段以及其他方法，来组织非法行动，而不是只对一个钻牛角尖，对另一个不管不顾。

黑豹党和“无产阶级左翼”1的命运都是由于对宪法和法律真实（法律术语）之间矛盾的错误理解，以及当有组织的抵抗发生时，这种矛盾的激烈程度增加而导致的。而这种错误的认识，使人们看不到：合法性的条件会因积极的反抗而改变，因此必须把合法性同时用于政治斗争和非法性的组织，而等着被彻底取缔是一种错误，好像这是来自体制的命运之锤，因为一旦被取缔就会是致命的一击，问题就会得到“解决”（the issue will be resolved）。

红军派组织的非法性，是作为革命干涉的进攻阵地。

组建城市游击队，就是要进攻性地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红军派把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民族的斗争和国际的斗争，政治的斗争和武装的斗争，国际共运的战略和战术的斗争联系起来。尽管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的革命力量很薄弱，而城市游击队在这里意味着用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干预！

克里弗（Cleaver）说：“要么你是问题的一部分，要么你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几代人已经从各个角度研究分析这堆破烂几十年了。我的观点是，这个国家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不需要再去分析下去了。” 2

**支持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必胜！**

红军派

1971.4

1 “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是法国的一个毛主义组织，1968年开始试图建立一个以工厂为根据地的游击组织。1970年被取缔。

2 埃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是黑豹党的信息部长。当该党分裂成敌对派系时，他自我流放到阿尔及利亚。他是几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冰上灵魂》（*Soul on Ice*），这里的引用源自此书。



谴责警察射杀佩特拉·谢尓姆（Petra Schelm）的传单，她被警察击中头部。

1971年汉堡“红色援助”组织制作。

#### 4

建立根据地与“为人民服务”

红军派在几个城市都有安全屋和支持者，还有几十名游击队员在地下生活，他们在两年时间里耐心地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期间与警察发生了几次冲突，造成两名成员死亡，还有许多人被关进监狱。

在1971年《城市游击概念》发表后不久，国家就开始了消灭红军派的第一次认真尝试。这次行动名为“眼镜蛇行动”(Aktion Kobra)，参与行动的有300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在德国北部进行城市巡逻，设立检查站。

1971年7月15日，当红军派的成员佩特拉·谢尓姆和维尔纳·霍佩（Werner Hoppe）在港口城市汉堡被警察认出时，某个新的界线被跨越了。随后发生了交火，虽然霍佩成功投降1，但谢尔姆被射杀。她当时才十九岁，是一位工人阶级妇女，通过公社圈子进入游击队，从“散兵游勇反叛者”转入了RAF。2

1 他最终将因涉嫌向警察开枪而被判10年。(Associated Press, “German Draws 10-year term,”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July 27, 1972.)

2 Baumann, 53

这起杀人事件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其后不久由受人重视的阿伦斯巴赫市（Allensbach）的民调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表示，“40%的受访者认为RAF的暴力动机是政治的，而非犯罪的；20%的受访者表示可以理解保护逃犯不被抓捕的努力；6%的受访者坦言，他们自己也愿意藏匿逃犯”。1

在APO之后，红军派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开始有了民间英雄的光环，他们乐于看到有人把事情做得更上一层楼。正如一位在这一时期加入该组织的女性所说的那样，“这是我第一次为一些在此之前我只是感觉到的东西找到了一个理论基础。”2

或者用赫尔穆特·波尔（Helmut Pohl）的话来说，他当时为游击队偷车：很明显，这是一种动力，一种决心，很简单，一种对新事物的探索——一种与这地方所有垃圾不同的事物。这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它获得支持的基础。这从一开始就存在，其他情况别无可能。”3

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他们的钱包里偷偷地携带着红军派系成员的照片，随着警方加大搜查力度，，年轻的游击队成员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大门向他们敞开，因为他们受到欢迎进入人们的家中，包括不少来自中产阶级支持者——学者、医生，甚至是有一位牧师。4当时的报纸以诸如“名人保护巴德尔团伙”和“同情者妨碍追捕巴德尔集团”这样的标题进行报道。5

游击队继续吸引新成员，包括“社会主义患者集体”（SPK）的几名前成员。SPK是一个激进的治疗团体，在其主要成员于1971年7月被捕之前，团体曾进行过一些武装行动（见下文注）。10月22日，汉堡再次发生枪击事件，但这一次一名警察被打死。前SPK成员玛格丽特·席勒（Margrit Schiller）加入了RAF，她被两名警察追赶时，格哈德·穆勒（Gerhard Muller，也曾是SPK成员）一名RAF女成员前来为她掩护：在随后的混战中，警官诺贝特·施密德（Norbert Schmid）被枪杀。

1 Varon, 199.

2 Margrit Schiller in Baader Meinhof: In Love With Terror.

3 Helmut Pohl在Stammheim审判中的证词，1976年7月29日。这份证词可在互联网上查阅：<http://www.germanguerilla.com/red-army-faction/documents/76_0708_mohnhaupt_pohl.html#22>。

4 Philip Jacobson, “Show Trial,” Sunday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23, 1975, 17.

5 Aust, 141